

第五篇

三晋大地，不敢匆匆走过的土地

一天，一位山西读者打来电话，说看了好几期我们的杂志，没有一篇文章说到山西，他强烈建议我去山西采访，说山西的文化积淀极其厚重，民间工艺也是丰富多彩。山西，在我脑海里主要就是煤炭。说来很惭愧，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我，对中华悠远文明丰灿文化所知甚少，那位读者在电话上慷慨激昂介绍了一大堆，我竟几乎一无所知！

放下电话，羞愧之余，我网上网下进行恶补。

“头悬梁锥刺股”几天下来，两眼读得闪闪发光，心中发出声声长叹——那片土地埋藏着如此丰富的“矿藏”，可我竟几乎一无所知！

三晋大地，又一个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尧、舜、禹三帝在此建都，尧庙、尧陵、舜王坪至今犹存；魏、赵、韩三家分晋，开启伟烈战国时代。

历史名人群星璀璨：廉颇、卫青、霍去病、关羽、杨业、薛仁贵；王维、王之涣、王昌龄、米芾、白居易、司马光……

古建筑居全国之首：宋金以前的木构建筑为106处，占全国同期建筑物的70%以上。其中全国五座完整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中，四座在山西。

恒山的悬空寺、永济的鹳雀楼、大同的九龙壁、朔州的汉墓群；宋金的社戏、元代的杂剧，明清的梆子、清明（寒食）节的发源地……

雁门雄关、平遥古城、晋商大院、黄土窑洞；寺院、古塔、石窟、壁画、古城、关隘、城垣……

民间艺术更是五彩缤纷：堆锦、皮影、剪纸、绢人、布艺、面塑、砖雕、木雕……据说：“山西——中国古代艺术的博物馆”；据说，要感受中国，就要感受山西。

可是，面对如此丰厚的三晋文化、如此众多的民间工艺，从哪儿入手呢？

是晋南的刺绣、剪纸、木版年画，还是晋北的石窟、寺庙、泥塑木雕？

是选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绛州澄泥砚”，还是选濒临失传的“长治上党堆锦”？

每一个文化遗存都让我神往，每一种民间工艺都让我动心！

最后，我决定分两次前往：

一，去晋中著名的平遥古城及晋商大院；

二，去晋北历史文化名城大同。



山西，晋商王家大院

(一)，古城里的传存

到达平遥古城，已是下午。这是一座拥有2700多年历史的古城，这也是一座侥幸逃过了“开发”刀斧的完整遗存。据说，它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明清县城。眼下，这大大有名的旅游圣地，招来八方游客。它那巍然的城墙、古老的街巷、深幽的庭院、陈旧的庙宇，对生长在传统断裂，被“现代化”包围的现代人具有强烈的诱惑力。于是，一群群旅游者、一个个参观团蜂拥而来。



平遥古城

小旗招摇，人头攒动，电喇叭声此起彼落。一家家店铺竭力“打扮”，大红大绿，店员们站立门外，吆喝声声。灯红酒绿的闪烁，卡拉OK的音响，熙熙攘攘的人群，高高低低的叫喊，让这座千年古城，充满了现代化的喧嚣。

它太有名了，介绍它的文字铺天盖地，因此，我不想挤进去添一朵花，只把目光转向平遥三绝之一的“推光漆”和鲜为人知的平遥“纱阁戏人”。

一，薛大师，在金钱的喧嚣中坚守

到了平遥，尚未品味到它的古老幽香，先被接二连三的推光漆器店弄得眼花缭乱。招牌闪闪、吆喝声声，纸醉金迷，心性迷乱……

有一位从古典传统中走来的老艺人，在追金逐银的热躁中独自坚守。



热闹的古城

推光漆器是平遥“三绝”之一，它起源于唐代开元年间，迄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具有色泽光亮、映影如镜、耐热防潮、画面美观等特点。因此，它既有实用性，又有欣赏价值。

平遥城里，卖推光漆器的店铺仿佛远比卖牛肉（平遥另一绝）的多，随便走进一家，都是琳琅满目：传统的如黑漆作底的描金彩绘、堆古罩漆、沥螺等，稍显现代艺术风格的如蛋壳镶嵌、磨漆等。大

的有屏风、家具，小的如装饰画、首饰盒等，一个个“骚首弄姿”，光彩诱人地引起游客强烈的购买欲。

其实，“推光漆”并不是漆的名字，而是制作漆艺的一道工序。它的制作工艺十分独特，有木胎制作、灰胎工艺、漆工、画工和镶嵌五道工序。其中要用人工手掌反复推擦，直到推得漆面生辉，光洁照人。其工艺的另一个特点是

描金彩绘，在漆面上作画，这需要具有相当的专业水平。镶嵌是把河蚌壳、螺钿、象牙以及彩色石头先加工成各种原件，然后根据图案巧妙地镶嵌在漆器上。经过手掌推光和描金彩绘，推光漆器手感细腻滑润，映影如镜，山水人物、飞禽走兽、亭台楼阁、奇花异草等各种图案借闪闪漆光熠熠生辉。

明清至民国中期是平遥漆器的兴旺时期，当时平遥城内就有14家生产漆器的店铺。从古至今，平遥漆器在山西特别是晋中地区十分流行，每个家庭都有一两套漆器家具，包括立柜、书桌、箱子、梳妆盒等，尤其是嫁闺女都得有一套漆器家具做嫁妆，几乎都是描金彩绘，非常富丽堂皇。

生于1937年的薛生金，是目前平遥资格最老的漆器艺人，他不仅全面掌握推光漆器



薛生金作品：彩绘猫戏图



薛生金作品：堆金首饰盒

制作工艺，而且颇有传统文化的修养，能够不参照任何图案或画稿独自设计创作。他告诉我们，他幼年时即随人学习画画，为戏剧舞台构建布景，曾拜民国时有名的漆器大师乔泉玉为师，从此一生与漆器为伴。他说：“当时师父不止带了我一个徒弟，但因为幼时深受父亲影响，极爱漆器，又有绘画的底子，所以学起来极快，师父也多次夸我有悟性。”

四十余年转瞬即逝，当初一起进厂学艺的同事们，有的天赋不佳半途放弃，有的一心去追寻发财，多数已在漆艺上默默无闻。唯有薛生金，不仅继承了师父的真传，更将面临失传的漆器艺术一步步恢复、发扬，形成了平遥特有的“薛派”漆器艺术。已失传的“堆鼓罩漆”工艺在他手上重生了；“三金三彩”工艺在他手上诞



薛生金作品：唐宫乐伎图

生了；推光漆装饰工艺也由过去的3种增加到20多种：开金开黑、堆鼓罩漆、彩绘勾金、三色金、晕金、搜金、三金三彩、沥螺、沥金银、软石镶嵌、蛋壳镶嵌等等。四十余年来，他从一个学徒成为一位全国工艺美术大师，又将大师级的手艺和感悟毫无保留地传给了徒弟、徒弟的徒弟……“现在平遥城里做推光漆的，没有哪一个不是我的徒弟或徒弟的徒弟。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我亲手带出来的徒弟就有100多人。”

眼下，有两个继承衣钵的儿子和那么多徒弟们在，他已不担心平遥漆器再失传了。闲暇时，他也常常踱着步子，到古城里走一圈——城里大大小小几十家漆器店的招呼声此起彼伏，生意一派火热。

但是，薛大师心里有深深的担忧。他说：“学艺最关键的有两点：一是热爱，二是天赋。技艺学得再好，不热爱它，不肯去钻研它，那无非就是学了个吃饭挣钱的门道，再不可能达到艺术的高度。现在平遥推光漆很有名气，旅游更火热，很多人学这手艺一心就是为了赚钱，根本说不上热爱。做推光漆，还需要绘画的功底。传统的画法，是艺人参照古画、精读诗书典故，然后独创而成。可现在的人已极少具有绘画功底，更没有传统文化的修养，为了赚钱，他们往往直接请人画好底稿，成批地复制。所以，尽管眼下城里那么多漆器店，可是能够不要参照就作画的人，大概也只有我一个。”



薛大师只有在物欲的喧嚣中
独自坚守

薛大师还感叹说，真正的手艺人，应当有一个宁静的心态，有艺术上的追求，但现在许多人太浮躁，一心只想把手艺变成钞票，他们没有耐心一步步按工序精推细描，不少人粗制滥造，漆器的质

量眼看着节节下降，产品以次充好。外行人很难一眼分出优劣，图便宜买回去，以为那就是平遥推光漆的水平，长期下去，平遥漆器整个行业的信誉和质量就要被拖垮。至于艺术上的提高，更是无从谈起。

采访时，几十家五光十色的漆器店正在古城大街上争奇斗艳，男女店员们在店门前声声招唤……

从古典传统文化中走过来的薛生金，无力同“现代”抗衡。在每天数万名中外游客“慷慨解囊”的诱惑中，在钞票哗哗的美妙响声里，有多少人能够静心去追求艺术和质量呢？

薛大师只有在闹哄哄的物欲喧嚣中独自坚守了，并寄希望于两个儿子和少数几个沉得住气的徒弟，盼他们担负起传承民族工艺的使命，保住平遥这一“绝”的精髓，并将其推到一个新的艺术高峰。

二，纱阁戏人，艺人虽去，佳作长留

在平遥古城里，曾有许多精彩绝妙的民间手工，可惜有些已经人去艺灭，如新南堡村可以在衣袖里捏出生动戏人的吴姓艺人，去世之后手艺与作品都失传。纱阁戏人也是平遥古城所独有的民俗文化遗产，据说还是研究中国传统戏剧和民间美术难得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但是，现在也没人再做了。庆幸的是，我们在平遥那个古老的清虚观里，见到了一组先辈们遗留下来的作品。

纱阁戏人是在演戏中使用的人物像，类似于皮影与木偶，它由洒金宣纸与稻草秸泥扎制而成。扎成的戏人服饰清晰而自然，着色后更为艳丽，就像真纱一样，纱阁戏人由此而得名。

纱阁戏人在平遥已有百年历史，据说是由该城纸扎店六合斋老板许立廷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制作的，这些作品没有遗失，现藏于平遥城内的清虚观里。

我们于是直奔清虚观。

清虚观，是一座全真教庙宇，始创于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庙宇呈三进院落式，分为牌楼、山门、龙虎殿、纯阳宫和东西廊房等几部分。纱阁戏人就陈设东廊房的第四至第六间。

廊房里，古朴的木桌上一



清虚观



纱阁戏人

字排开28个色彩班驳的木阁子，木阁是纱阁戏人表演的空间与场地。剧目上至春秋战国，下到宋元故事，如《春秋笔》、《南阳关》、《司马庄》、《岳飞北征》、《狐狸缘》等等。纱阁的左右内侧都书有题记，内容多为人生的感悟和做人的格言，如《鸿门宴》写有“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飞虎山》则是“水惟善下能成远，山不矜高有极天。”题壁既有深刻的思想，又有明确的针对性，既有正统思想的传播，又有民间谚语格言的存留，它就像教科书一样，承载着传统文化与道德教化的使命，这也是纱阁戏人所独有的特点。另外，纱阁戏人在演出时，都伴有梆子唱腔，具有当时民间曲艺艺术的特色。

戏人一般是用草秸泥、麻纸、宣纸等材料扎制而成，戏曲角色一应俱全，生旦净末丑，脸谱色彩艳丽，活灵活现。戏人的高度由于受到戏台空间的限制均都只有50厘米上下，场景中的演出人物也大都选取三、四人，戏剧所用的道具，如刀枪棍棒、桌椅床幢之类都是由纸扎而成。

不过，纱阁戏人不同于普通的纸扎工艺，也不同于普通的泥塑戏人。纱阁戏人的制作要经过构制骨架、泥塑头靴、裹纸与装饰、制作道具等步骤。人形骨架由高粱秆与稻草扎成；戏人的头和靴用石膏模子铸成，出模后，先打泥，再上色。戏人的装饰要在戏人的身上包裹上一层草纸，外面再装饰一层洒金宣纸，还要画脸谱、贴头饰、戴服饰等。道具也是用高粱秆裹纸上色后做成。待上述各项制作完成后，一并装入木阁，纱阁戏人便大功告成。

纱阁戏人用料虽普通，制作手法和工艺却十分讲究。它不仅要求制作者要有绘画、雕塑、书法、剪纸方面的天赋与基本功，还要求制作者具有传统戏曲文化的知识。现今纱阁戏人尚有人会制作，但大多不懂传统戏剧因而只能仿制而不能独立创作。手艺原本也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断层了，传统工艺也难以有深层次的发展。



纱阁戏人

当然，相比那些完全断气了的民间手工而言，纱阁戏人还是令人欣慰的。毕竟，它被保存下来了。

（二），晋商古宅，斯人远逝，高墙空立

三晋大地，一块沉甸甸不敢匆匆走过的古老土地。

太多的历史遗存，太深的文明积淀，轻轻抓一把秋风，竟揽得满怀的沉重。

山西晋商，一群早已消失而又几乎被遗忘的民族精魂。

太多的悲欢离合，太多的英雄伟业，稍稍捧一段家史，竟读得双目灿烂。

想当年，这群生长在三晋大地上的铁血男儿，走西口、渡黄河、跨长城、越太行。纵横三万里，驰骋数百年，栉风沐雨，呕心沥血，打下一片金融的天空，创下一份显赫的家业。

时代的潮水，起起伏伏漫过人世的春秋；岁月的苍桑，点点滴滴吞噬了豪杰的伟业。烽烟之后，宿鸟归飞，斯人长逝，票号与信义、茶庄同道德，皆随出谷的长风消逝。

惟有带不走的深宅大院城楼高墙，尤自空立在这块厚重的土地上，任晨风暮雨敲打，听游人骚客感怀……

一，萧瑟秋风，吹过巍然庭院

680多年前，一个名叫王实的汉子从太原来到晋中地区的灵石县，在一个叫静升镇的地方打短工，卖豆腐。数百年暮雨晨风，代代人日耕夜读，王家一步步发展，一点点积累，终于英辈迭出，气冲牛斗，红透了静升“九沟八堡十八巷”。

如今，显赫一时的王家已经衰落了，大院内的3000男丁早已飘零四方，不知所终。惟有二、三百年前修建的王家大院，穿过了战火的硝烟，“文革”的焚火，“丢盔弃甲”地挺立到现在，让幸存的高墙、褪色的彩绘、残留的雕刻，在秋风中殷殷地召唤游客。

灵石王家，“民间故宫”

当年晋商留下的大院中，最大的是位于灵石县的王家大院，因此，我把它作为首选。它离平遥古城不远，离那清明节（寒食节）的发源地锦山更近。一大早，乘车直奔王家大院。

一路上烟尘滚滚，空气很差，现代“煤都”消解了怀古思幽的情趣，不过，当那一大片远山上的黄墙青瓦蓦地跃入视野时，精神一振：山西，你远比煤炭厚重的财富就在眼前了！

无需进门，在大门处往里一望，



那等气势，已让人心生敬畏。

我先找到王家大院民居艺术馆馆长侯延亮，送上杂志，报出家门。他很热情，略一交谈，便感到他是个文化人——这种地方，我很怕遇到上级派来的官员。他不仅亲自给我作了一番讲解，还特地派了一位优秀导游陪同讲解。

她叫王海琴，一位颇具几分古典娴雅的纤弱女子，她神态宁静，嗓音轻柔，一边微笑着在前引路，一边娓娓讲述——

“王家大院整个建筑面积有25万平方米，现在修复后开放的主要是高家崖建筑群和红门堡建筑群，共有4万5千平方米。高家崖修于嘉庆年间，周边城堡紧围，大小院落有上下左右相通的门户，因此给人以院内有院、门里套门的迷宫般感觉……”

出花苑，过石桥，便到红门堡。背倚高坡面向平原的红门堡，其实更像一座固若金汤的城堡。堡内88座院落，按“王”字的写法整齐排列。王海琴说：“红门堡布局就像一条龙。高高耸立的堡门是龙头，东西两眼水井是龙眼，堡内纵贯南北的甬道是龙身，甬道上铺砌的卵石是龙鳞，各条小巷是龙爪，堡墙后曾经与堡门遥遥相对的那株柏树则是龙尾……”

88个院落无法一一细看，便登上离地28米高的堡墙，让目光纵横驰骋。虽说这些年我也到过不少古老大院，但如王家大院这般气势和规模的实在少见，它仿佛已不是一个民居建筑群，而是隐隐有皇室气派的大宅豪门。正如《修复王家大院碑记》开篇所言：



红门堡堡墙上的大门门楼

“国有古宫而知皇室之威严，民有王宅而知晋商之显赫。明清之际，海内最富者山西也，山西最富者晋商也，晋商最富者灵石王家也。”

我看到的仅仅是它原有规模的五分之一，然而，那气势和规模已给我一种巍然皇城般的威压。

王海琴说，大院还有好多建筑群（即一个

个“堡”）现在没法修复开放，因为住了当地老百姓，眼下无力组织搬迁。不过，建于明代的王家凝固堡正在修复，准备开发成娱乐休闲场所。当然，也有不少“堡”被彻底毁了，无法再修复，比如拥有众多小院的崇宁堡。

高墙后面，是一片萋萋荒草绵延黄坡，那儿曾是王家600年祖坟所在地，占地300多亩，据说当年非常壮观，碑石林立，像一座城垣。可惜，300多亩坟茔遇到了十年“文革”，它们全部“玉碎”，被改造成了“大寨梯田”。



崇宁堡中多为这种小院，可惜已全部被毁，无可修复

画栋雕梁，养眼润心

站在城楼上望去，整个建筑群是北方的雄伟气势；走进院内，触目却有南方的细腻秀雅。在大院内行走，有一种置身于雕刻艺术博物馆之感。院内院外，梁上梁下，门前门后，随处可见精雕细刻的艺术品。其中最具有特色的是它的“三雕艺术”，即木雕、石雕和砖雕。这些雕刻，不仅艺术精美、而且内涵丰富，细细观赏，不仅养眼，而且润心。

例如在养正书塾，进门的门框用石雕的竹子装饰，竹子顺着门框节节升高，顶上枝叶相绕喜鹊报喜，其寓意是希望后代刻苦学习，节节升高，金榜题名。王海琴说，这件石雕艺术品得以保存下来，全靠当时住在这个院里的那家农民，他很喜欢这个门框，因此，在红卫兵来打砸院内的封建遗物时，他用石灰把石雕门框封起来了。王海琴还说，上世纪80年代一位南方商人非常喜欢这个“节节高升、喜鹊报喜”，甚至愿意以一辆小汽车的天价来换取它。



石雕竹子，寓意“节节拔高”，顶部是“喜上眉梢”

砖雕是王家大院的一大特色。梅花喜鹊表示“喜上眉梢”；公鸡牡丹表示“功名富贵”；鹿与鹤寓指“六合同春”；菊花鹤鹑梧桐叶表示“安居乐业”。还有屋脊上仰天长啸的“鸱吻”。鸱吻是传说中龙的九个儿子之一，一般装饰在殿堂建筑的正脊两端，起防火、辟邪，守护家宅的作用。王家大院的鸱吻都是开口，与我后来在其他晋商大院看到的闭口鸱吻不同，这也有寓意。王家虽是经商，但非常注重功名仕途，“以商贾兴，以官



开口向天的鸱吻

“四逸图”，它表现了渔、樵、耕、读的悠闲生活。这幅作品让我感到古人生活的那种淡泊宁静，我拍照回来后常常独自欣赏。另外，让我多次品味的就是那手卷训辞：忠持己恕及物，勤治生俭养德……

院内的木雕不仅题材丰富、艺术手法多样（有浮雕、圆雕、镂空雕等），而且蕴涵着中国古老文化和深厚积淀。一个小孩怀抱一条肥鱼，旁边雕一朵莲花，表示“年年有余”。红门堡绿门院在“仁礼传芳”的匾额前，是一幅通廊木雕《满床笏》，该木雕不仅非常精细美观，而且寓意深长。它表现的是唐代名将郭子仪六十寿辰时，七子八婿皆贵为显要、堆笏（笏：古代臣下上殿面君时的工具）满床的盛况，由此既表达了主人富贵昌达的憧憬，又寄托了文人志士忠君报国的理想。



宦显。”是王家的“指导思想”，在王家鼎盛时期入仕为官的，仅二至五品的就有12人。而为官之家的鸱吻为开口模样，意思是要仗义执言、为民请命。

大院里处处有道德说教或“警示语录”，如在司马院东西两边墙上有一对墙雕手卷训辞：“忠持己恕及物终身可行，勤治生俭养德四时足用”。我最喜爱的一幅砖雕是



木雕“满床笏”

楹联匾额，诗书气华

大院里的可以反映民俗民风的家具摆设等早已无影无踪，诗书字画在文革时也被一把火烧得灰飞烟灭。但是，木柱上的楹联、门庭上的匾额还在（也许是新近修复），从一个个大宅深院走过，最打动或者说滋润我心灵的，就是这些无处不在的楹联和匾额。



在五十四幢大宅和一条条通道中穿行，举目一块块匾额一对对楹联，赏心悦目，书法多样，造型各一，那上面的文字，既有行为规范和做人哲理，也有励志诫勉和修身养性。

在一个通道的屋檐下面，一块匾额上书四个烫金大字“三省四勿”，提醒人时时不忘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和孔子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视履”、“观我”，想必是提示自己考察个人所作所为；“桂馨”、“映奎”，盼的是科考顺利、出类拔萃；而“敦诗说礼”、“树德”、“平为福”、“品行兼优”等匾额不言自喻。

我更喜爱的是楹联，它不仅文字生动优美，书法龙飞凤舞，而且蕴涵和传递的内容更丰厚。

“簌簌风敲三径竹，玲珑月照一床书”，读到这种文字，仿佛清凉晚风拂面，翠竹飒飒作响，尘世的喧嚣与纷烦随风而去。在藏谱阁下面的一座布满雕刻的院落里，一对木柱上的楹联是：

“晨兴理荒秽心远地偏聊寄武陵意，戴月荷锄归夕露沾衣顿生桃源情”。在“平为福”匾额前，一幅楹联是：“寡欲清心能受苦方为志士，宽宏大量肯吃亏不是痴人”。书斋前的楹联是：“万卷诗书四时苦读一朝悟，十年寒窗三鼓灯火五更明”。

我最喜爱的一幅楹联是：“穷不悖义达不离道惟盼箕风毕雨，乐极生悲否极泰来但思皓月冰心”。它一下子让我生出一股泰然大度之气，尤其是“穷不悖义达不离道”和“但思皓月冰心”，那种做人原则和超然的境界既细细密密滋润心灵又坦坦荡荡提升了神魂。后来我给学生讲到“三晋文化”时，专门提到了这幅楹联，没想到不少学生也深深被它所触动。



如今，大院早已人去楼空，但遗留的那一幅幅饱含诗书气华的楹联匾额，让人觉得它的精魂神韵仍在。如果说大院的高墙城楼是它雄伟壮观的肉身，那么它庭院里的楹联匾额就是它意境悠远的精魂。或许，浮躁的现代人，在扑面而来的文化和艺术气息中，能感受到祖先与当下截然不同的人生境界。

秋风萧瑟，美韵残缺

从600多年前那一声叫卖豆腐的吆喝起，王家近20代人前赴后继，亦商亦官亦儒，一步步打下了25万平方米的“巍峨江山”。



占地300亩、延续600年的王家坟地被改造成“大寨梯田——”王家大院的坟地遗址

日移星摇，“风水”轮转。100余年前，王家开始衰败，不管是地利天时之牵制，还是不孝子孙之糟蹋，总之，早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劈天而降之前，大院已是“此地空余黄鹤楼”。

阎锡山的士兵驻进来了，解放军的炸弹丢进来了，“土改”后分得“果实”的农民搬进来了，“红卫兵”破“四旧”的战火烧进来了，“农业学大寨”的锄头挖进来了……

一些大院（如崇宁堡）被拆毁了，好些石雕木雕艺术品被卖掉了，占地300亩、延续600年、近似城垣的王家坟地被改造成“大寨梯田”。还有，据馆长侯延亮介绍，“文革”时，“红卫兵”将大院内的“软件”——各种文字资料，如诗书字画、账本、族谱、信函等等搜缴一空，整整堆了两间屋，然后一把“革命”的烈火，烧毁了“封资修”的灵魂。

“所以，现在我们研究王家600年历史，很缺乏文字资料，不得不找一些老人回忆。”侯馆长无奈兼痛心地说。

幸而，王家两个主要的大院还可以修复。1999年，在动用土石九千九百余方，青砖三百余万块、木柴三千五百余方、耗资三千余万元之后，红门堡、高家崖、祠堂院以崭新的面貌重显雄姿。更庆幸时代由“阶级斗争”转入了“经济开发”，大院残留的雕梁画栋倏地在旅游开发的滚滚热浪中凸显出黄灿灿的金钱魅力（门票60元）。游客从四方八面蜂拥而来，那不知真假的“王家豆腐”猛然间卖得火热……



与王海琴（右二）合影

尽管，秋风萧瑟，在张口而无语的鸭吻间冷冷掠过。

二，光灿夕辉，照耀昭余古城

祁县（古称昭余）古城，又一个位于山西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它始建于北魏孝义帝太和年间（公元477—499年），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

祁县自古以来名人辈出，仅文人中就有王允、温峤、温大雅、王维、温庭筠、罗贯中等等。

到近代，祁县又“出产”了全国著名的巨商大贾，商业帝国纵横海内外，成为晋商核心地带。

如今，晋商的风流已被雨打风吹去，祁县古城里，留下了几家豪宅大院。

1，渠家大院，花开花落

沿着一条古色古香的街道，穿过一座一面题写着“晋商风韵”，一边题写“昭余古城”的华丽“牌坊”，来到一堵高大的“城墙”前。拱形的“城门”上，刻写着“纳川”两个大字。

“城门”左边，挂着一块长牌，上书“山西省晋商文化博物馆”；右边，立着一块石碑“渠家大院”。

渠家大院，是祁县晋商留下的著名大院之一，也是祁县里又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当年，渠家曾是晋商中大红大富之家。

渠家的先祖渠济自明初开始创业，在上党和祁县之间奔走，艰辛谋生。四百多年过去了。渠家第十四世孙渠同海从“走西口”的庞大队伍中脱颖而出，生意遍布全国乃至蒙古、俄国和欧洲，积累了大量的商业资本。渠家在清同治、光绪年间达到了辉煌的顶点，乃至清史中记载“山西多富户”，就以渠家为例。



渠家到底富到何种程度？年代久远，资料散失，而渠家后裔也早已飘零四方，无可统计。民间传说，清同治、光绪年间，渠家一共开设了5家票号，占到了全国票号总数的五分之一。同时，还在国内各大中城市和水旱码头开设有商号。渠家“长裕川”记的砖茶，在俄国甚至可以直接当作货币使用。辛亥革命后，渠家一次就借给阎锡山军政府30

万两军费……，

同大多数意欲光宗耀祖、叶落归根的晋商一样，渠家也大建豪宅。于是，祁县城内出现了一大批气势不凡的建筑：大院、豪宅、茶庄、票号……当地人说，祁县古城东半城的东大街、新道街、高园圪道、段家巷、小东街和仓道街等，大多数是渠家的房产，因而人称“渠半城”。

走进眼下的这个大院，感觉它虽然没有王家大院那般气势，但雕梁画栋，诗书意气毫不逊色。

我很感兴趣的是里面展出的晋商文化。



晋商泛指旧时的山西商人，当年雄踞徽商、湖商、粤商等十大商帮之首，晋商的商业活动范围遍及全国，远涉俄罗斯、东欧等地。设在大院的博物馆里，有这么一段话“晋商雄据中华，饮誉欧亚，称雄商界五百多年，尤其是明清两代，晋商成为国内势力最大的商帮，同时也是国际贸易中一大商人集团。”

晋商的辉煌已经成为过去，它留在我心里的，是它创业时的艰苦奋斗和经商时的“企业精神”。

展馆中提到渠家的渠同海“走西口”。“走西口”是当年山西商人走向蒙古和俄罗斯时穿越和驻留做生意的一个关口，在现山西右玉县边上，叫“杀虎口”。山西商人从1696年一直走到1935年。

“走西口”虽然是晋商发达壮大之源，但它留下了多少艰辛、悲壮更是悲凉的故事！不少人一踏上“走西口”便长年难归甚至一去不回。多少恋人望穿了眼，多少少妇等白了头，多少新娘从此守了寡。村头分手，背影西去，也许就是生离死别。那首著名的歌曲“走西口”无论是歌词还是曲调都非常感人，现在，我们在大谈晋商当年的辉煌伟业和历史贡献时，有多少人想到他们当年抛妻别子的无奈，尤其是那些女人们的痛苦。说到这儿，我想到眼下那些演唱“走西口”歌曲的女歌星，从她们嘴里，我总听不出“紧紧地拉着哥哥的袖，汪汪的泪水肚里流”那种痛切肺腑的悲伤。歌星们用技巧在演唱，不是用情，更不是用心。在灯红酒绿的都市繁华和众多粉丝的热辣欢呼中，她们怎么能产生“心”、“情”去体会村头一个女人的悲情。



晋商的“企业精神”尤其让我敬佩，是什么呢？主要有这么几点，一

是进取精神，不畏艰辛，敢于冒险；二是敬业精神；三是群体精神；四是经营意识，珍惜诚信。其中我最赞赏的就是诚信。晋商在那几百年里，以诚信为本，同“走西口”一样，也留下了大量感人的故事。而诚信，是眼下从我们政党到商人到一般民众最缺乏的东西，也可以说，是我们最愧对祖先的地方。

明清山西商人中有不少受过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具有相当的文化素养，这对经商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形成了他们的新文化观。晋商中一位重要代表人物王现说：

“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洁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



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恪守其业，天之鉴也。”这段话出自一个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山西商人口中，令人惊叹。它不仅点明了经商的不二法则，也道出了为官与为人的基本遵循。

在渠家大院一个门庭上，雕刻有一个很显眼的大白菜，白菜下半部是白色，上半部是青色，

其寓意是“一清二白”，也就是说，做人和经商要坦坦荡荡，一清二白。

此外，在大院里，高悬着一块块牌匾或题字，上面大书：“善为宝”、“读书记”、“慎言语”、“慎俭德”、“养心斋”、“德星朗耀”等等，与王家大院里的那种精气神是一脉相承。

博物馆的介绍上说：“晋商文化是一种独特的现象，是宝贵的历史遗产。”

十大商帮之首的晋商在清末民初衰落了，博物馆列出了十大原因，主要就是战争、动乱、俄国革命、外蒙独立等等。称雄一时富甲一方的渠家也黯然退潮人去楼空。

百年过去了，城头早已变换了大王旗，渠家的万贯财产也早已不知去向。好在还留下这么一个大院，虽然雕梁画栋朱颜失色，但总可以让人来感怀或评说当年的“青春红颜”。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况且，40元的门票是渠家为后人创下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经济增长点。

况且，大院里那个大戏台还在，戏台上那付楹联还在无声地传播古老的声音——

“借古喻今教化众生知伦理，以假为真规劝世人明是非”。



大院里那个大戏台还在

2，渠家茶庄，石雕和灵肉都损伤

渠家茶庄“长裕川”，曾响遍海内外，想当年，茶飘四海，白银汇聚，气吞万里如虎。如今，沧海桑田，物是人非，茶庄仅存几个院子，一垛残破的巨大石雕。

十月，山西的清晨已觉轻寒。沿曲折蜿蜒的小巷走去，来到高悬两盏红灯笼的门前。

这里就是祁县渠家的茶庄，名“长裕川”。

长裕川大院院墙高耸，俨然一座城堡。

长裕川茶庄是晋商中最大的茶庄之一，开办于清乾嘉年间，总号在祁县，汉口、安化、长沙、南昌、成都、扬州、张家口、绥远、包头、西安等地设有分号。经营茶业的特点是产运销一条龙。产品以各种型号的砖茶为主，极受蒙古、俄国市场欢迎。除茶庄外，长裕川一度时期还曾经营盐业，获利也相当丰厚。

进门是两个小院。西南院是为茶庄培养专业人才的学院，对面则是茶庄掌柜们办公的地方。

迎面是一幅巨大的青石浮雕，浮雕高约15米、宽10米，虽然残破但气势不凡，与我以前看到的传统石雕大不相同。粗大方正的石柱透出西方教堂式的威严肃穆，头顶上，几尊无头的残破佛像茫然地端坐着，猜不出是何方神圣。

一位妇女闻声出来，问我们为什么没买票，得知我们的身份后，她介绍说，她叫陈春风，是茶庄博物馆的检票员，喜爱看书，在这茶庄算得上个专业导游。



她带我们边走边解说。她说，正因为生意做得大、做得远，渠家主人便见多识广，因此才造出了与别家不相同的门楼雕刻。这垛大青石雕刻，既有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和典故传说，又充分体现了西洋的建筑风格。

青石雕刻的整体造型、四方的门柱、高高在上的雄狮、院内支撑窗台的石雕吉祥鸟等，都带着西方的文化艺术特色；而大禹神兽、罗汉菩萨、琴棋书画、鹿鹤松柏、施衣舍饭等石雕和图案，又丝丝缕缕透出中华传统的文化气息。由此可以感到这渠家主人果然“学贯中西”，既饱受中方的浸润，又深得西方的感染，所以造出这垛中西合璧的石雕和这座含有西方元素的大院。



在一个雕着中国传统图案的窗台下面，有一只形态很生动的西方鸟儿，陈春风说，她一直想弄明白这只鸟的身份和含意，但问了无数的游客，没有一个人能回答。我仔细端详，然后用我所有的那一点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作了一番我自己都不知对错的云里雾里的解释，陈春风居然很惊喜，连连说，我是第一个给她讲解的人。

学院窗台上雕着《朱子家训》。在长裕川，学习茶叶的经营管理只是其中的部分课程，更重要的是学做人。陈春风说，长裕川茶庄录用人才的标准是近乎苛刻的，即使一个小伙计，除了五官端正、能写会算的基本要求外，还要“家世清白，需得力人士担保举荐，试用期三年”。开在外地的分号，除了门房、接待、送信等人用当地人之外，其余店员皆由祁县输送——这样严格的用人制度，保证了晋商特有的“信”与“义”，使得茶庄生意远至世界各地，而“长裕川”的砖茶在俄国、蒙古甚至可以作为货币流通。

但同大多数商号一样，动荡年代的炮火轰散了长裕川的繁盛。伙计们遣散了，主人举家逃往四川，账本不知所终，惟只剩下这座院子。

但是，院子也没逃过被蹂躏糟蹋的命运。

侵华日军看上了大院，把茶庄当成了指挥部。西南院修成了澡堂，大量的污水被他们顺手泼在院子里，使得地基下沉。院门口的大青石浮雕，顶部已被扯开了两条小指宽的裂缝。

还有，渠家举家逃亡时，有40万两白银没有来得及带走，埋在了院子地底下。日军挖防空洞，意外地发现了这笔巨款，日寇大喜，全数运回日本。事后，还不无挖苦地致函渠家，表示“感谢”。最奇特的是，这封“感谢函”辗转数十载，最后落到了“红卫兵”手中。“红卫兵”据此判定渠家为汉奸卖国贼，不由分说将渠家主人抓来斗打，渠家主人因此又丢了性命。



被打烂的和合二仙之一，
和合二仙寓意“和气生财”。



被打烂的大禹和他的坐骑。
教育学徒要学习大禹的敬业精神

日寇占据了院子，掠走了银子，但未毁坏石雕和房屋。几十年后，手举铁锤的“毛主席的红卫兵”杀来了。他们首先冲那典雅的大青石浮雕门下手。

叮叮当当，碎石乱飞。

然而，由于石料坚固，“红卫兵”们战果不大。他们恼羞成怒，把这个“砸烂旧世界”的任务交给了当地的一个石匠。石匠领受了这项光荣的“革命任务”，架起梯子，一阵专业性的敲打，于是，佛像的头和脸没有了，雄踞的石狮威严尽失了……



“偶来松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唐·太上隐者《答人》）



石雕舍饭报恩。韩信早年靠漂母舍饭度日，发迹后以千金还报。

不过，虽然渠家茶庄的石雕和灵肉都受到损伤，但总还有一个大院幸存，它那精美绝伦的雕刻艺术和文化内涵仍然让人赞叹和感叹不已。

只是，面对那些残破的雕像，心头有些困惑：这些祖先留下的不乏震撼力的艺术之美，当初怎么就没有令那些充满革命激情的年轻人生出一丝不忍与爱惜呢？一个政党、一种学说，要把一个人的大脑洗成什么模样、把心灵毒害到何种程度，才能让他如此疯狂——就像阿富汗的塔利班炸毁千年艺术瑰宝巴米扬大佛。

3, 乔家大院，难以转身说再见

在所有的晋商大院中，乔家大院最为知名，这不是因为该大院超过了王家、渠家、何家、曹家等，而是因为张艺谋在这儿拍了一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

它太有名了，有名得我都想放弃它；它太拥挤了，拥挤得我不想挤上去再献一朵鲜花。不过，看了里面《乔“在中堂”家世述略》，心有触动。

远远地，便听到嘈杂的人声，看见攒动的人头，小旗帜上下翻飞，电喇叭此起彼落。

进入大院，游人如织，热闹非凡，叫喊的，拍照的，呼朋唤友，你来我往……人们忙着看什么呢？宠幸的大红灯笼？高墙下的“嫔妃卧室”？

好在大院里办了一个“祁县民俗博物馆”，虽然这些民俗早已成为昨日黄花，但其中蕴含的风情韵味仍然令我兴致盎然。

不过，最吸引我的是大院建造者乔致庸的为人处事和家风祖训。

《乔“在中堂”家世述略》中有这么一段话：“纵观乔氏一族，由勤而富，富而不



乔映霞笑笑回答说，那就算了吧。杨老五双膝跪地，给乔映霞磕了一个头，6万两白银的债务就此一笔勾销。

“大顺公”绒毛店欠“复盛公”一千大洋，象征性地还了一把斧头和一个箩筐，即算了结。

乔家有一掌柜，因经营不善亏了20万两银子，但乔家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又投入了30万两银子让他接着经营。掌柜感激不尽，勤谨敬业，苦心经营，终于赚了大钱，报答了乔家的知遇之恩。

……

乔致庸与现在那些暴发户完全不一样，生就一份从容淡定。他不仅自己讲信重义，以身作则，而且告诫儿孙，经商处事要以“信”为重，其次是“义”，不骗人，不挣昧心钱。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摆在首位。乔家把“以义制利”四个字写入了家训：“首重信，次讲义，第三才是利。”

同时，乔家又诫“骄、贪、懒”，家训有六不准——不准吸毒；不准纳妾；不准虐仆；不准赌博；不准嫖娼；不准酗酒。乔致庸以《朱子治家格言》作为每日的行为规范。儿孙如若有过，则令跪地背诵，如犯抛米撒面之错，便把“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反复诵读，直到认错为止。乔致庸还把他亲拟的对联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农惜食非惜财，缘



惜福”。以此告诫儿孙，注重节俭，不要贪图安逸，坐享祖业。（正是如此，乔家庞大的家族没有出现一代一代的纨绔子弟，避免了诺大家业败于子孙之手。）

以商立家业，教育为根本，诚信是本分，谦和处乡邻——据说这就是乔家的治家秘诀。

了解了乔家（也是晋商）的这种重信讲义品质，对照眼下社会（自然包括商家）的种种坑蒙拐骗和巧取豪夺，心中非常感叹：中国社会是进步了吗？！我们丢失了前辈哪些最宝贵的东西？

由此也想到我们所废除的“封建科举制度”。从小，我就受到“科举制度”是万恶的封建社会产物的说教，又读到“范进中举”之类的文章和《陈独秀传》，更是增加了对科举制度的厌恶。可后来，看到“党选官员”的任人唯亲制度、看到“红二代”“官二代”的“世袭”、看到无处不在的买官卖官，突然觉得，靠十年寒窗、金榜题名，从而走马上任的科举制度真是无比的优越和廉洁……

话说远了，回到大院。

在大院里，我还很了解的是，这座大院是怎么保存下来的。

乔家子孙早已在兵荒马乱中飘落四方，带不去的，惟有这百年老院。它竟然能完好地保存到现在。

这些年，我到了不少地方，看到很多古迹都毁于“文革”，遇到保存下来的，我都感到好奇，想要得知它是怎样在那场大劫难中死里逃生。



李鸿章题写的匾额“仁周义溥”



木雕葡萄和砖雕葡萄。寓意有二：一是期盼多子多福，二是希望一本万利，因此多见于经商的人家。

实厚重，以前修建时就是花了大功夫和费了大银子来保大院安全的，没想到在乔家人去楼空多年后，它拦住了“毛主席的红卫兵”。

几天后，不甘心的“红袖章”们趁着原老汉开门清扫之际突然冲进了大门。关门已经来不及了，情急之下，原老汉往甬道中间一站，大叫一声：“不准动！这是国家财

一个导游说，乔家大院曾两次化险为夷，躲过了那场“大革命”。

1966年夏季的一天，一群“红袖章”举着铁锤斧头，高喊“横扫四旧”，向乔家大院汹汹杀来。当时大院被县委党校占用，但师生们早已停课闹革命去了，只有一个叫原成瑞的老汉看门。原老汉眼看“红袖章”们冲来，急忙将大门关上，任凭外面杀声震天，就是不开门。大院是一个全封闭的院落，院墙10余米高，大门结实



砖雕“琴棋书画”及“暗八仙”

产，谁敢破坏？谁要砸，我就把钥匙交给谁，你们哪个敢负责？”说着，把一串钥匙摔在了地上。“红袖章”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愿出头，只好又退了出去。原老汉就这样上演了一出“当阳桥”，保住了大院。

也有人说，乔家大院能保留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当年乔家一向宽于待人、对乡邻也特别关照，每年都要花费大量银两济困扶贫，赢得了极好的声誉。正因如此，在“文革”到来时，乔家堡的村民自发组织起来保护乔家大院，使之既没有被破坏又没有被瓜分。这是乔家行善积德的善报。

对这两种说法我有点怀疑，那场“大革命”声势浩大，玉石俱毁，毛主席的“红袖章”们堪比希特勒的“冲锋队”，狂热而又暴戾，一个原老汉或普通村民怎能阻挡？



乔家屋脊上为闭口的鸱吻，因商家需要保守商业机密，故而与仗义执言的官家不同。

也是在1966年夏季的一天，“红卫兵”冲进宝鸡市扶风县有1700多年历史的“关中塔庙始祖”法门寺。德高望重的良卿法师拼力阻止，结果被打得头破血流。当狂热的红卫兵开挖埋有佛祖指骨舍利子的佛塔，要毁掉千年的稀世珍宝时，无力阻拦的良卿法师只得把自己全身浇满煤油，火光冲天地补向佛塔……

不管怎样，大院保存下来是事实，这不仅让人拍了电影，而且留下了又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亮点”——财源滚滚的门票收入。

步出大院，向那高高的围墙回望，觉得那些雄峻建筑、精美雕刻等都不重要了，里面最重要的是让人们看到了那逝去的晋商风范和民族精魂。

三，吕家大院，依依不舍的凄美

在大同城外二十多公里、桑干河与御河交汇之处，有一大片黄土高原上独特的冲击平原。在这片土地上，坐落着一个名叫“落阵营”的村庄。300多年前，一个叫吕天平的汉子来到这儿。百年渔樵耕读，子孙亦官亦商，数代之后，一个占地百余亩的大院——吕家大院——阵容显赫地矗立在两河交汇之处。

吕家大院同晋中地区的晋商建筑群一样，属晋商文化的一部分，曾有“南有乔家大院，北有吕家大院”之称。

二十世纪中叶，桑干河畔红旗狂舞，雁门关外黄叶飘零，巍然挺立了百余年的古老大院在改朝换代的骤雨狂风中砰然“玉碎”。巍峨吕家“江山”，变作“百姓”家园。

半个多世纪又过去了，我踏着二月冷冷的太阳，迎着河畔迷乱的东风，走进那早已被历史抛弃，亦被世人遗忘的大院。

伸出双手，推开破败但依然沉重的大门。

与雄伟壮观的王家大院相比，它确实是在太破败惨淡；与名声显赫的乔家大院相比，它确实是在太孤寂落寞。但是，它却是又一个代表晋商文化的大院。

如果不是大同的朋友介绍，我根本不知还有这么一个大院，一是它远离了晋商集中的晋中地区，独自一人默默呆在偏远的晋北乡下；二是它早就被人遗弃和遗忘，任凭塞北的寒风吹打。

然而，一眼望去，它对我的冲击绝不亚于王家大院。但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它的苍凉、冷寂、荒寒、破败，它那残留在坍塌壁墙上的诗画、隐现在杂乱荒草中的雕刻，更让我感到岁月的苍桑历史的悲凉。

心里，涌起一种惆怅和感伤。



据了解，以前吕家分为南大院、胶坊院和旗杆院等。现在胶坊院已荡然无存，油坊院也只剩两个院落，只有旗杆院保存稍微完整。据说仅旗杆院这六个相互连通的大院就花费了13年时间才建成。

推开现存的那一扇扇颇有历史苍桑感的大门，空荡荡的院子

早已不见昔日的华彩，幸存的房屋尽是年久失修的破败景象，但是，门庭残墙上，晋商宅院的文化艺术气息仍然可见。

据大同县党校的梁斌龙先生说，当年所有的院落，曾经都是门上挂牌匾，门前栽旗杆，高高的台阶，威严的石狮。每一院子都是三进三出，过厅廊檐，画工精细。屋顶上所有的兽头都是张嘴铁甲兽。据说这种张嘴铁甲兽，只有那些取得功名，享有一定权力和地位的人家才可以拥有。可惜，在“文革”的狂风暴雨中，这些高耸于吕家门楼屋顶上的精美的装饰品，被“红卫兵”砸了个片甲不留，只有屋顶中央蹲立的一种叫“鳌”的、像虎又像狗的怪兽幸存下来。

幸存下来的当然不只是“鳌”。

不知是由于当年“红卫兵”们革命任务繁重，在“破四旧”中时间、精力不济，还是分得“果实”的农户惜财爱物，在“大扫荡”中“坚壁清野”，总之，浩劫之后，竟然还有一些“封资修”的文化和艺术幸存了下了。

保存得最完好的，是几幅石砖照壁。

这些照壁一般设在侧门之内，背靠山墙，雕刻画面上有飞禽走兽、人物诗画等。东院的“三元图”，雕刻的是三位书生等待大考张榜，盼望金榜题名的情形，上面题有“碧桐茂蔚荫高轩，又见凌晨喜鹊喧，借问仙禽何所报，祯祥早以兆三元”的诗句。



南院的一幅照壁上题诗：“桃杏花开日正长，红莲不觉依池苍，黄花别我无多久，一树寒梅又放香。”借用桃、莲、菊、梅，寓意春夏秋冬，教导子孙把握四时节令，不违农时，珍惜时光。

除了砖雕，大院里还可见到不少木刻、门墩、石鼓等。在一个大门门楼两侧的上面，竟还有几幅古旧的壁画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那上面的图案让人追忆农耕生活的安详与宁静。

在一个堆满玉米的院子里，我们遇见了吕家唯一“留守”的后代吕介华。吕介华今年16岁，看上去有些腼腆，但眉宇间透出聪颖和灵气。他说不上他是吕家的第几代子孙，对自己祖先的辉煌也所知甚少。不过他知道这被瓜分了的大院曾是他们吕家祖先的财产。说起大院，他有一个愿望：今后像他哥哥一样考上研究生，读书、挣钱，然后回来修复大院。

望着目光炯炯的吕介华，看到他提到哥哥便生出自豪的神态，不禁想到吕家人才济济、英辈迭出的辉煌。

曾多次去吕家大院调查的梁斌龙先生说，吕家大院的第十代后人吕学良老先生曾编了一本家谱，为研究吕家大院的历史提供了一份十分宝贵的资料。

吕家世祖叫吕天平，传说此人系李自成的一个族侄，原本姓李。“闯王起义”失败后，他隐姓埋名来到落阵营村谋生。改为吕姓之后，他娶妻生子，把“耕读传家”、“笃志诗书”作为家训，和他的子孙们一代接一代地努力，把落阵营村西的一片乱石河滩改造成了肥田。



吕介华



吕氏家族真正的兴起，应从乾隆末年的吕庆说起，此君勤劳吃苦，精明能干，又精通诗书。吕氏家业到了这一代人手里有了相当的发展。吕庆的孙子吕宝是吕家崛起的关键人物。

这时，中国的民族工业开始兴起，一些新兴地主阶级已经不完全满足于传统的农耕生活，开始有了市场意识，有了经商观念。吕宝便是雁门关外偏僻农村中开化较早的一位。他虽然从父辈手里继承了不少土地，却没有被土地束缚住手脚。他一生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经营油坊上，由于管理得法，经营有方，吕家油坊很快就发展成为大同地区食用油的名牌产品。据说，吕家油坊门前车水马龙，购货者络绎不绝。随着财力的增加，吕家在几十年内先后买下了晋蒙两地的许多油坊，几乎垄断了北方的食用油市场。

与吕宝同一辈份的吕璠，饱读诗书，一举成名，历任云南孔阳州知州、盐大使等职，特任河

南大府诰授三品，封中议大夫。

吕璠之子吕生春曾担任戊子、乙丑江西省同考官，直隶天津县知县加同知衔。他还精通医术，曾经为朝廷中的达官显贵诊脉看病，享有“官中御医”之美誉。

此外，吕家的吕清奇、吕璠、吕玕、吕生直、吕生江、吕生渭等，都是不同年代出类拔萃的人才。

为了更好地查看吕家大院，我从农家借了一架木梯爬上屋顶。屋顶



站在筒瓦上望去，颓墙衰草，
扑面是西风残照的凄美

上的筒瓦经历百年风雨，竟坚硬如石。站在筒瓦上望去，黄土、青砖、灰瓦、庭院、曲巷、拱门，气势仍在，残韵犹存，只是颓墙衰草掩映，扑面是西风残照的凄美。

经历了百年风雨苍桑的吕家大院守着她最后一点残余的姿韵在遗忘和遗弃的沉默中黯然寡居。它没有王家大院、乔家大院、渠家大院那份幸运——从颓败的墙角里抱出来，朱红点唇、胭脂抹脸，光光鲜鲜地推到台上，笑靥迎游客，玉指点钞票。

没有。一样的山西大院，一样的厚重文化。可惜，御水河边，羌笛空鸣，“春风不度玉门关”。

吕介华今后能够挽狂澜于既倒，读书、挣钱，让她梅开二度，青春再现？

不过此时，残破的门楣筒瓦间随风摇曳的荒草传出一种令人神思飘逸的凄美，颓败的黄墙灰砖上冬日阳光的映照唤起一种岁月深沉的感怀。正如血红夕照中，古罗马斗兽场破损的残美比完整的壮丽更透彻心灵。

离别时，回首望去，那轮塞北边陲的夕阳正好叠印在院落里一棵光裸寒枝的背后。

四野寂静，光影迷幻，一种怅然若失的感伤，细细密密爬上心头。



结束语

山西晋商，曾称雄商界500年！

想当年，他们小本创家业，大笔写春秋，忍抛妻别子之苦，受餐风露宿之累，一点一滴，聚沙成塔，把一股农耕土地上生出的商业豪气，轰轰烈烈推到海内海外。

大江南北的票号，蒙古俄国的贸易，金融、商业、工业、实业……

正当长风浩浩，气势如虹之时，时代的大动荡到来了。

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日俄战争、辛亥革命、世界大战、十月革命、蒙古独立……

亿万银两被“革命”了，众多的票号被剿杀了，精明而勤奋的山西商人，纵有经天纬地之才，金山银海之阔，亦无力挽狂澜于既倒。

其实，就算能挺过那一波接一波的狂涛巨浪，又焉能逃过后面那斩草除根的“土地改革”和“三大改造”？

所以，从舞台上黯然退下，消隐到历史的深处，是山西晋商悲壮而无奈的命定。

惟有这一段幸存的城阙和几个残留的大院穿过历史的烽烟挺立到现在。

雕花重檐里，分明可见逝去的荣华富贵；斑驳楹联上，隐约可品当年的文化精神。

想重头再来，从历史的深处寻拾起那依旧闪光的精魂，革心洗面，抬眼望天。

巍巍的城楼未倒，沉沉的土地仍在，只可惜，长风不兴，日蔽云乱……

第六篇

山西大同，历史和现代的遗存

洛阳，大同（古称平城），一座已有2300余年历史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从战国时代的“边陲要地”，到工业社会的“厚黑煤都”，大同穿越两千年边关寒月，三万里塞外风尘，一路铁血刀枪，侠胆柔肠，把晶晶闪闪的泪光与焰火，挥洒在历史的逶迤画廊。

纤弱昭君，怀抱一把肝肠寸断的琵琶，黯然回首，出平城，马蹄声碎，迎面北方高原朔风悲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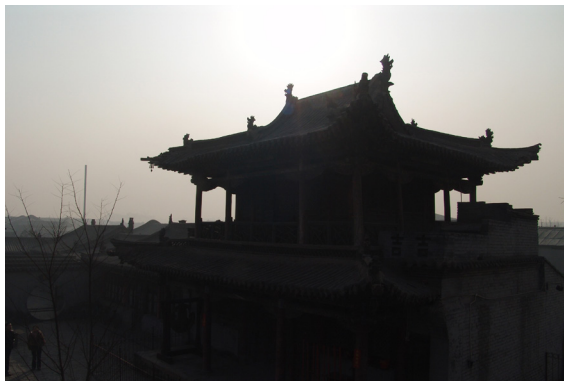
伟岸苏武，紧握一杆节旄落尽的汉节，巍然南归，穿雁门，牧歌悠远，留下一段千古回荡的忠烈。

阴山脚下，长城内外，汉高祖、孝文帝、成吉思汗、薛仁贵、杨家将、李自成、阎锡山……一个个英雄豪杰、壮士枭雄，为这“北方锁钥”、塞外古城，你争我夺，演绎了一曲又一曲“燕赵悲歌”。

匈奴、鲜卑、突厥；长城、军堡、箭楼。胡人与汉兵争雄，游牧与农耕碰撞。岁月的风烟散尽，胡汉交汇，都融入华夏神州的同辱共荣。

走在这三代京华、两朝重镇古老土地上，早已听不见大宋杨家诸将的悲绝长啸，觅不到蒙古成吉思汗的铁锈弯刀，唯有北魏留下的云冈石窟、宋辽修建的应县木塔、连同辽金的华严寺、明朝的九龙壁，残光艳照，挟一身厚重文明沧桑历史，鲜鲜活活矗立在面前。

于是此刻，放下“平城”从未平静的岁月感怀，放下大同何时“大同”的殷切企盼，走进这历史文化名城，触摸那一段文明，放歌那一群艺人。



一，云冈石窟，佛光璀璨的明珠

大同城西15公里处的云冈石窟，距今已有1600年历史。它坐落在武州山南麓云冈村北的悬崖下，东西长1公里，现存大小洞窟147个，佛像5万余身，是我国著名的三大石窟之一。

如今，伴随着整个开凿岁月的北魏王朝早已成为历史，绵延一个多世纪的斧影锤声也消匿于苍烟流水。然而，1600年前的惊世杰作，却穿过大自然的风沙雷电，人世间的战火焚烟，大体完整地保存下来。

从一个又一个的石窟前走过，心中有一种无力的绝望：纵然皓首穷经，也把握不全石窟所蕴涵的无比丰富的宗教、文化、艺术、科学、历史、社会内涵。

公元三、四世纪，印度雕造佛像的艺术沿着古丝绸之路逐渐东传，一路留下了大大小小的佛像石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古龟兹国所建的克孜尔石窟和敦煌石窟。

雕造艺术自西域和河西走廊再往东移，便到了北魏的京都平城（现大同）。

北魏，这个由北方游牧民族鲜卑人拓跋氏创建的帝国，从其开国皇帝道武帝起，就对佛教心生敬畏。道武帝刚迁都平城（公元398年），就下诏请一个叫法果的和尚主持全国宗教事务。法果和尚手捧“最高指示”，心怀宗教热忱，立马轰轰烈烈大干起来。当他在武州山发现几个天然洞穴时，一部伟大作品便注定要横空出世了。

法果利用那个最大的天然洞穴劈下的第一斧，便是今天云冈石窟的第三窟。

在整个云冈石窟群中，第三窟最大也最奇特。洞穴分前后室，上部东西两侧各雕一座石塔，可惜现大多数已



风化。石窟内现有象征孝文帝太子元恂的主佛像阿弥陀佛，和立于其右侧的菩萨像等。由于千百年来沙石的吹打，佛像下身已经风化，看上去已是“残疾人”。第三窟的创凿，从公元398年断断续续绵延到公元523年，历经125个春秋，几乎浓缩了北魏王朝的整个历史。

云冈石窟大兴开窟造像的帷幕是由一个叫昙曜的高僧拉开的。此僧守着青灯黄卷，费移山之力，在武州山留下了赫赫有名的“昙曜五窟”（第16至第20窟）

说到“昙曜五窟”，不得不提到发生在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的那一场惨烈的“灭佛运动”。原本崇佛的北魏第三任皇帝太武帝由于种种原因下令全国灭佛。龙颜



第三窟主佛像阿弥陀佛



第二窟主佛像交脚弥勒佛

一怒，佛门血溅，一时间寺毁经焚，像倒僧逃，全国的佛、寺、僧遭受灭顶之灾（昙曜虽得太子拓跋晃暗中相救，但也只得如丧家之犬逃往外地）。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灭佛运动——太武之厄。

好在太武帝因灭佛短了他的阳寿，很快赴了黄泉；好在继位的文成帝一反其祖灭佛政策，即位伊始便着手复兴佛教。

劫后余生的昙曜高僧住在劫后余生的云冈石窟旁，伴着青灯黄卷，听石鼓寒泉，苦苦反思冥想：这场浩劫是如何发生的呢？如何避免它再次发生呢？君王们都喜怒无常，谁能保证文成帝和他之后的君王们不突然龙颜大怒，又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昙曜苦苦冥想了整整七个春秋寒暑。一日，眼前的断岩巨石和先辈法果高僧的“皇帝即当今如来”之语，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让他在黑暗里看到了光明。对呀，开石窟建造如帝王之身的大石佛，不就栓上了“政治保险绳”了吗？

于是，昙曜将他欲在武州山“如此如此”造佛像的构想，向文成帝“如此如此”呈述一番，文成帝心领神会，马上拍板批准。

于是，轰轰烈烈的凿窟造佛像（兼“造君王”）工程开始了。怀着对佛主的虔诚，怀着对君王的敬畏，春秋寒暑，栉风沐雨，一窟接一窟，六年内，一口气开凿了五窟。

五窟内，均有一个“顶天立地”的主佛，它们各自有佛教中的佛名，但又分别象征北魏不同的帝王。

昙曜第一窟的主像释迦牟尼佛，他位于莲花座上，高13.5米。昙曜凿该窟时，所造佛像对应北魏王朝的始祖——神元皇帝拓跋力微。隐喻神元皇帝建国立业。

昙曜第二窟的主像为交脚弥勒佛，佛像高15.6米。此窟佛像对应北魏道武帝拓跋圭。

昙曜第三窟的主像为阿弥陀佛像，高15.5米，主像两旁雕刻有4名胁侍菩萨和众位弟子像。此窟主佛像对应的是北魏太武皇帝拓跋寿，也就是那位灭佛的皇帝。（昙曜仍塑这位“凶手”，算是“大肚能容”？）

昙曜第四窟。这是昙曜五窟中最大的一窟，其主佛像也是云冈石窟中最高的一個，达17米，仅一个脚趾就长1.6米。他对应的是北魏文成帝，也就是批准此项工程的皇帝。

昙曜第五窟。此窟著名的“露天大佛”（高13.7米）被誉为云冈石窟的代表作。佛

正襟危坐，赫赫一股挺拔大气，其面容韵味无穷，能从不同视角体味出佛的慈祥、庄严、普救、入定、持世、震慑等诸多佛的品格神态。

据说，昙曜造这尊佛是象征文成帝以后的北魏拓跋氏诸帝王。看来，昙曜可谓深谋远虑，在以此五方佛像象征北魏诸帝时，涵盖了过去、现在、未来。

这五窟石佛形象高大，气势磅礴，造像面貌丰圆，神态安详，高鼻，深目，阔肩。雕刻技法粗犷豪放，造像神秘而又充满活力，既有佛的神韵又有北方剽悍游牧民族的特征，表现出夺人的气魄和强烈的艺术生命力。

站在窟顶虽然崩塌、双手已经残缺，但主体依旧完好的代表作——露天大佛前，不禁想到1600年前的当当斧声，袅袅香烟，想到先民质朴、宁静和敬虔的心灵，尤其想到那位用心良苦的高僧昙曜。

以权势来保障宗教（佛）的平安长久，恐怕难以长久平安。有哪一个姓氏的江山是平安长久的呢？露天大佛落成后不到100年，北魏王朝就寿终正寝了。至于众佛们，在上个世纪中叶一个外来的幽灵劈天而降后，同儒、道一起“三教齐灭”，都被“革命”了。



第18窟弟子像



“露天大佛”——云冈石窟的代表作

在昙曜之后，云冈石窟又迎来一个“建设”热潮，这就是北魏冯太后和孝文帝执政的北魏鼎盛时期。

凿窟造像从云冈石窟中区的西头开始，13窟、12窟、11窟，由西往东移。此阶段的造像题材内容丰富，佛教故事里各种人物形象雕刻得栩栩如生。佛像中不时出现二佛并坐，喻示冯太后摄政，辅佐幼主，二王并立（依然是“天子即是佛、忠君便是礼佛”）。这十几个窟的雕刻技艺精美华丽，艺术手法丰富多样，服饰雕刻也与孝文帝大力推行的汉文化相配合，出现了汉民族世俗的褒衣博带式袈裟。贵霜帝国的犍陀罗艺术与其他文化在此交融并合，使



每一寸“土地”都被精美的艺术……（第11窟）

一下子找到了曾在意大利诸教堂里的那种赞叹：每一寸“土地”都被精美的艺术和宗教的热诚细细耕耘过！

管他是否有世俗王权的影子和象征，毕竟皇帝们的意志、愿望、热忱和财政支持，创造了中华文明史上一颗“佛光灿灿”的明珠，与几十年前那场“造神运动”所留下的无数僵尸般的呆像和丑陋不堪的“语录丰碑”相比，算得上是真正的“伟大光荣正确”。

几十年前那场“造神运动”毁灭了中华几千年和文化艺术，但非常庆幸的是，云岗石窟侥幸逃脱。据云岗石窟佛像雕塑大师李志正事后告诉我，这全靠当时大同那位叫王明选的文化局长。王局长是个老革命，战争年代被打瞎一只眼。他是个很质朴的人，也很有感召力。他对红卫兵讲，大同的辽金彩塑和云岗石窟都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不是迷信、不是封建“四旧”。由于王局长特殊的经历和感召力，红卫兵听了他的话，云岗石窟因此免遭劫难。



第12窟内景

孝文帝在公元494年迁都洛阳后。云冈石窟雕凿的辉煌也随之而去。此后虽然仍有斧声陆续响了几十年，留下了从21到53号石窟，但终是散兵游勇，不成气候，不提也罢。

二，应县木塔，巍立千年的神奇

应县位于大同西南70公里，内长城要冲之地。它辖有北楼口，胡峪关等重要峡口。1000年前，宋辽两军常在此刀兵相见。为了窥测军情，弘扬佛事，人们建造了一座高大的木塔——应县木塔。近1000年过去了，木塔依然巍巍挺立，其建筑技艺与法国的艾菲尔铁塔、意大利比萨斜塔齐名，被世人称为“世界第三大奇塔”。



这座修建耗时100余年的木塔（佛宫寺释迦塔）距今已有940年历史了，被认定为世界现存最古老、最高的木塔。

它居然不倒！

木塔67米多高，重达7400吨，全用木头搭建，不用一钉一铆，但任凭千年风雨雷霆，它就是不倒。

它经受了十多次5级地震，安然无恙；它鹤立鸡群，昂首傲

立，没有避雷针，但从不遭受雷击；它在军阀混战中多次身中炮击，就是不倒不燃……

人们说，这是一座神奇的塔，有佛主保佑。

不过，遇到不信佛的无神论狂徒，它就受伤了。

文革时期，红卫兵杀进来，冲着木塔内一座高约11米的释迦牟尼金身塑像下手（该塑像据说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室内泥塑）。他们在佛像的心窝和胸部一阵敲打，破出两个洞，从里面掏出了金银和经书。经书看不懂，全烧了；金银都认得，私吞了。如今洞已用泥补上，佛像身上留下两个难看的伤疤。

这座木塔是谁修的？又是个谜，那些艺人、匠人们运用了大智慧，下了大苦力，也许还有人流了血，送了命，但历史总是把他们忘记，木塔上下，寺院内外，看不到一个能工巧匠的名字。

倒是塔上那51面牌匾，名声显赫。其中有明成祖朱棣的“竣极神工”、有明武宗朱厚照题的“天下奇观”、有清宣统应州知事任绪瀛题的“竣极于天”……帝王将相，达官显贵，文人墨客，有名有姓，木塔上熠熠放光。

登上木塔，俯视桑干河，遥望恒岳山，自有一番历史岁月的感怀；穿行于严谨精巧，交错默契的斗拱群，不由涌出对千年前工匠们的聪明才智和刚毅坚韧由衷的赞叹。



洞已用泥补上，
留下两个难看的伤疤

三，恒山悬空寺，高悬半空的“三教合一”

恒山，横亘于大同之南，为五岳中的北岳。它西衔雁门关，东跨河北，南屏三晋，北临燕云。108峰奔腾起伏，绵延数百里。

在恒山金龙峡口悬岩绝壁上，建有一座寺庙，这便是著名的悬空寺。

在朔风啾啾的二月，来到恒山金龙峡。一股寒凉之气扑面而来，举目望去，荒裸的绝壁上，一座空中楼阁，上载危岩，下临深谷，殿宇楼台傍壁栖崖，朱廊丹户曲折临空，又险又奇。心中赞叹，难怪徐霞客称它为“天下巨观”。

从摇晃的铁索桥上渡过结了冰的金龙峡河，来到它的脚下。这儿，有一个题刻着“壮观”二字的石碑。据说李白当年在此惊得目瞪口呆，竟写不出诗句，只得写了“壮观”二字。

此时正是天寒地冻朔风呼啸时节，几乎没有游客，这对于进入悬空寺庙中那狭窄的栈道环廊颇为有利。



顺着石阶攀爬上去，进入寺庙中。寺庙的建筑由寺院、南楼、北楼三部分组成，南北二楼上下对峙，殿阁均是三层檐歇山顶式结构。全寺共有楼阁40间，在陡崖上凿洞穴插悬梁为基，楼阁之间有起伏窄曲的栈道相通，栈道之上又起双层檐楼，虽处峭壁半空仍然设有三面环廊回抱。走在窄窄的栈道上，峡谷啾啾风来，俯视下面的河谷，颇有些心惊胆寒。而伫立在楼阁里，望飞檐翘角与苍天群峰构成的画面，又感到一种透彻心灵的壮美。据大同雕塑大师李志正说，从前悬空寺还要“悬空”，可惜前些年人们在紧靠寺庙上方的峡谷上修水库，大量碎石泥渣倾泄下来，抬高了河床，使得悬空寺“变矮”了。据说始建初期，位于最高的三教殿，距地面有90米，现今只剩下58米高。尽管如此，“变矮”了的悬空寺仍然让人

惊叹：当初是谁想出这个怪招，又是哪些艺人匠人不顾身家性命来完成这项工作？

据有关资料考证，公元491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下诏将道教的天师道场移到恒山，兴建崇虚寺。天师道长寇谦之在遗训中指示，寺庙要依托山崖建在悬崖峭壁之上，这样才能“上廷宵客，下绝嚣浮”。崇虚寺依此建成后，由于其悬空的显著特色，改称为悬空寺。由此看来，寺庙悬空是为了道家“不闻鸡鸣犬吠之声”的渴望，为了断绝喧嚣浮躁（是否还有“肮脏”）的尘世，向往天庭的神灵、纯净、安详。

“创意”的出处找到了，但那些舍生忘死的艺人和匠人却姓名全无。可以想象，1500多年前，攀爬在绝壁悬崖上，顶着峡风寒流，一斧一锤劳作的艺人与匠人们是何等的艰辛。也许，这些普通劳动者也是有着虔诚宗教情怀的信徒。



恒山悬空寺是一个“三教合一”的寺庙。寺内，佛堂、道殿双全，既有佛教的三佛殿、释迦殿、地藏殿、观音殿、伽蓝殿，又有道教的太乙殿、三宫殿、纯阳殿和佛道共容的关帝殿，甚至还塑有孔子、释迦牟尼、老子三像于一殿的三教殿。

北魏时期，佛、道两教产生矛盾，屡屡发生“佛道斗法”事件。太武帝时，还发生过大规模的“灭佛”悲剧，社会因此而动荡不安。幸而那位具有雄才大略远见卓识的孝文帝出现了，他不仅促使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民族大融合，而且促成了北魏的“三教合一”。他为使国泰民安，特地建造了这座“三教殿”，也让佛道儒三教共同辅佐北魏王朝。三个宗教荟萃一堂，堪称“安定团结”和“大肚能容”。“三教合一”深得民心，致使以后的历代帝王争相效仿。

现在？它只是一个令人赞叹的建筑了，更是一个挣钱（60元门票）的旅游景点。在释、道、儒三教兼受至命重创的今天，一拨又一拨游客来了，照几张旅游风光照，留一声到此一游的赞叹，观赏了寺庙外壳——悬空的建筑，来不及领略其精神内涵——宗教情怀，便匆匆上车，奔赴下一个景点。

原想“悬空”以绝尘寰喧嚣浮躁的寺庙，因其“悬空”终日不堪尘世的喧嚣。

1500年漫长岁月，寺庙经历狂风地震巍然不倒，是不是当初宗教虔诚根基扎得牢，是不是“三教合一”齐心协力共保寺庙平安？

只是，眼下“三教殿”虽在，但“三教合一”的古韵神气早已不存。

可惜。

四，大同城里的手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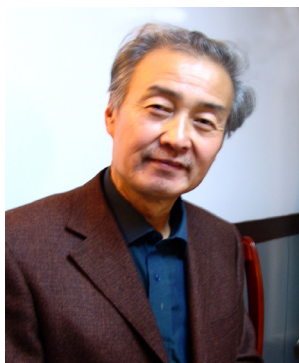
大同，古为三晋北方之门户，素有古战场之称。数不尽的热血男儿曾经在此金戈铁马，驰骋疆场。

如今的大同城，已是一片宁静祥和景象。我们在大街小巷奔走数日，认识了一帮执著而淳朴的手艺人。对这片土地和文化的热爱使他们组成了一个紧密团结、互帮互助的小集体，每个人都充满了使命感、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尽管，他们的收入甚至难以养家糊口。

1，大同艺人群的“领军”人物李志正

李先生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在大同艺人群中，他是集手工技艺精湛、宗教素养丰润、美学见解独特、人文知识厚重为一体的大师级人物。我与他初次遇见是在太原。一群人中，唯有他“仙风道骨”，扑面一股超凡脱俗之气，柔和中有刚毅，亲切里有稳重，慈眉善目，目光炯然，一眼望去，绝非眼下那种“打造了双手而未打造心灵”的艺人匠人。同李先生交谈，再看他的作品，心底暗暗一声喟叹：就是他了！



四个月後，我再到山西，他专程陪我去云岗石窟、华严寺等地。一路交谈，感佩甚多，我们从此成了知心朋友。下面的文字，是我记录的他的讲述。

我一生坎坷，命运多舛，也许，我原本不该来到这个世上。

我家是地主，按“新社会”的标准，我是“剥削阶级”出身。我上小学时，母亲和姐姐就在艰难中去世了，父亲是随傅作义起义的国民党军官，但镇反时又被杀了。

我读到高中时，遇到那场全国性的大饥荒，我饿得二楼的教室都上不去。饿到后来，“天目”都开了，成天看见眉目间一个大大的窝窝头。毕业写作文，我在纸上写：“快饿死了，还写什么作文？！”

我没有参加高考，因为看得清楚，像我这样出身的人，考得再好也上不了大学。

我去了当了一名矿工，在大同煤矿第七矿。那些日子，爬进爬出，干最重的体力活。

我在煤矿整整干了11年！

怎样走上艺术创作之路？说来也是时代造就。那些年，矿上经常要搞革命宣传，搞阶级斗争教育展览，矿工们整体文化低，我在其中算是秀才，就让我拿起了画笔。我画毛主席的像，画“三忠于”（即“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文革后期又在陶瓷厂做玩具。

就这样，我从一个挖煤工变成了一个手艺人。

让我脱胎换骨的是云冈石窟！

20多年前，云冈石窟研究所的所长李治国邀我到云冈石窟临摹，打算设计点旅游纪念品。我以为凭自己的造型能力，临摹几个佛像是很容易的事。但一干起来我才发现这不是一般的临摹，我面对的是古时先民们创造的一个博大、深邃、厚重、神妙的宗教艺术世界！我白天在洞窟临摹，晚上对着照片资料整理，说来惭愧，这些非常详尽的资料竟全是日本人几十年前做的。我越深入越感到吃力，三个月过去了，每天干十二个小时以上，才勉强做了五个头像，而且还很不完善。

但是，我从此与云冈石窟、与古人的宗教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它逐步影响并改变了我的心性、性格、心态、观念和艺术创作。

佛教因其进足以救济苍生，退足以超越自我的精神内涵，暗合汉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文化氛围而得以生根。佛教以寂静的美对芸芸众生行以渗透式的心智磨炼，这恰好与中国道教以自然为依归、清静无为的情调相契合。佛教的主旨是教化、启蒙、希望人们回归善良、增长智慧。佛教历来注重偶像的教化，开凿云冈石窟就是对佛学完美的诠释和心灵的寄托。



他的铜雕作品《合掌露齿菩萨》，无论从哪个角度观赏，都让人击掌赞叹。



李志正作品，千手观音

云冈石窟的佛像看似简单，实则内涵深广，神韵无穷，有一种特别的精神气质。我逐渐在那些佛像上看到一种纯粹的净界，那里面没有功利，没有浮华，没有俗气，是一种纯真的信仰，纯精神和心灵的境界，特别的大气、正气、虔诚。

在造像中，形象就是内容。大佛头面庞饱满丰圆，鼻高坚挺、目深细长、肩膀展阔、胸廓宽厚，造型圆中有方，近看有棱有角，远看眉清目秀。神态慈祥而不软弱、刚正而不生硬、伟岸而不傲慢，平和中透着鲜卑人强悍、豪放的尚武精神。大佛前倾的体态既适宜信众近距离观瞻又体现出关照众生的亲切感，那对芸芸众生充满关爱和期待的眼神，只要与你的目光对接，就教你一生一世无法释怀。

佛像身躯雄健挺拔，眼观鼻、鼻观心，超然入静。其外表却又做得圆润丰满，表面看柔，里面有刚，外表像母亲一样温柔平静，里面有父亲般的阳刚挺拔。这种内刚外柔的形式美是处子之美，是女性的大道之美，柔弱是生的法则，“人法自然”就是要守柔，守柔曰强。

还有，佛的笑容很神秘，我认为那是得道觉悟后会心含蓄的微笑，是一种领悟了万世万物（而世人还未领悟）之后的笑。所以成功的佛和菩萨造像魅力无穷，永远不会审美疲劳。

云冈石窟的佛像近看有棱有角，远看眉清目秀，反映了先民们敬虔纯真的心态。俗人、功利之人做出来的东西，

不管他手怎么巧，总有一种俗气，而缺少具有纯真信仰的先民们的那种正气、大气和神性。宗教传的时间长了，也会腐败，现在的佛像，到处贴金，做得不好的，贴金来掩饰，十分俗气。在云冈石窟之后的龙门石窟，就比云冈石窟小气，有一种脂粉气。

艺术是时代文化的标志，欣赏北魏云冈石刻造像不得不提及发祥于同时代的魏碑书

体。魏体多用方笔，如斧如凿、棱角分明、无丝毫圆滑世故之态，与魄力雄强、厚重浑朴的北魏云冈石刻造像有异曲同工之妙。透过这两座标志，我们可以窥见游牧的鲜卑民族与农耕的汉民族文化交融渗化后形成的宏图远志方兴未艾的北魏风骨。

人造景观、景观造人。云冈石窟经典造像犹如直面灵魂的镜子潜移默化地完善你的人格，矫正你的人生指向，引导你回归古典之美，是抑制时代病——“心浮气躁”的一剂良药。爱因斯坦曾说：“只要深入地探视了宇宙和生命的神奇，就不能不产生宗教情怀。”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已经从科学认知和惨痛的教训中觉悟到：人类的智慧可以毁灭一个地球，但不可能再造一个地球。自身与自然的和谐才是求得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



李志正作品，佛头像



李志正作品，佛像

站在这个高度，心念宁静地仰视大彻大悟的觉者形象，我们将会感悟到更多的生存智慧。

长期的探讨使我感悟到这些石头、泥土塑造的形象，看似简单，实则是高度的简洁，具有佛像特有的形式美。观赏者在这种美的引导下会不由自主地进入一个清风朗月的祥和境界，我临摹研究的过程也就不自主地成了修行内省的过程，思想境界潜移默化地得到净化，让人静下心来感悟解读佛法的博大内涵。形象的刻画和佛法的解读都是艰涩的过程，但却是渐入佳境的过程，这种逐渐感悟的美妙没有亲身经历是难以体会的。真正了解佛学的人较少，大多是在佛像的感召下朦胧觉悟佛法精神。这就是佛像被称为法像的原因。艺术是时代文化的标志，石窟中精美圣洁而又质朴的法像正是早期佛教信仰的虔诚和佛教精神的博大的标志，是先贤们质朴品格的写照，是他们以真挚的情感进行创造的反映。这是多么宝贵多么圣洁的精神财富啊。庄严而辉煌的神的美其实是现实生活中的理想美，显示着先民对生命认识和生命渴望的一种表达。他们所创造的是超越死亡追求永恒的精神境界，是用生命刻写的民族文化史，是对信仰的形象诠释，犹如一面关注人生直面灵魂的镜子，教人学会欣赏美、追求美，潜移默化地完善人的人格，矫正人的人生指向。

我在临摹研究中受益匪浅，时间长了像是进入了一种磁场，犹如打座，屁股仿佛离了地，但又我坐得特别稳。我以前心理素质一向不好，是做佛像调节了我的心态，让我变得宁静。我后来连做十几个小时不累，心里特别舒畅，脑子也非常清晰明白。我觉得佛像中含蕴的深邃内涵，应该是治疗时代病——“浮躁”的一副良药。因为现在的人非常浮躁，满脑子功利、金钱。官员们搞云冈石窟旅游节，请些歌星来几万元唱一首歌，成千上万的人大红大绿喧闹一通，而对佛教佛学、石窟佛像的神韵和精神内涵一无所知。有些官员的素质太差，对民族文化没有起码的了解，也说不上尊重，只知道钱。

当然，在观看、研究、临摹中，我也发现古人有做得不完善的地方，这很正常，艺术本生就是一种遗憾。我要做的就是古人雕像的基础上做一些加减法，做出来的作品与原像不完全一样。这也是一种创造，但更是圆梦，圆我的梦，圆先贤的梦。这不光是手工了，还是一种修炼心性，心要诚，要静得下来。现在，我力求进入先贤的理想境界，完成几尊理想的传神形象，告慰先贤的在天之灵。

现在，我已基本把握了云冈佛像的神韵，我做出的佛像已得到各方的一致好评。当然，我也希望这些形象以工艺品的形式走进千家万户。至于能挣到多少钱，我考虑得不多。我想，若能让千千万万的人透过我的作品以虔诚的心态倾听到远古悠远的历史回声，感受祖先与子孙同在，生命与艺术联姻的境界，则是远胜于物质的回报。



“观音手”又名祈愿。祈愿人类以虔诚的心态认真反思自己的行为；祈愿人人都能以一颗善良的心、一双慈悲的手保护环境、关爱生命、与自然和谐相处；祈愿人间充满友爱。——李志正

2, “那感觉很美, 比钱强多了”

他是个刚健的男子汉, 却有一双细致的巧手, 将团团黑泥揉捏、描画成栩栩如生的泥人。他费尽20多年的心血钻研手艺, 不为钱财, 只图那种感觉。



我曾采访过惠山泥人大师喻香莲和王南香, 也曾采访过著名的天津“泥人张”, 比较熟悉他们的作品。在大同第一眼看到盛向东做的泥人时, 几乎误以为它们就是那些大师的作品。

盛向东是大同一名普通市民, 创作泥人已有20多年了, 还在上小学时他就爱用泥捏小动物、飞机坦克等小东西玩。

“泥人捏得比我好的大有人在, 就说咱大同城里, 任健老师的泥人就非常值得学习, 他的泥人都是本色的, 风格粗犷, 乡土味浓郁。而我的泥人以人物为主, 除了塑形, 更重彩绘。”

在盛向东的泥人小至3厘米, 大到30多厘米。他说, 最难做的是泥人的头发。为了使人物表情传神, 他还常常对着镜子观察自己的各种表情, 并细细揣摩各类人物的穿戴、神态、特征, 以达到最佳效果。

他的朋友说, 他的泥人几乎都是白送给朋友。去年大同的艺人们在广场开展览, 他的泥人大受欢迎, 结果他三、五元一个半卖半送, 还乐呵呵的。

盛向东说, 他费心费神地做泥人, 目的不是为了钱, 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将大同泥人打响。“很多人都喜欢泥人, 但市面上一个泥人要上百元, 普通家庭很难拥有。我就想努力做‘平民’泥人, 题材反映平民生活, 价格也不贵, 让它们走进更多家庭里, 能让它们成为咱大同文化里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就心满意足了。”

除了捏泥人, 盛向东还会修门锁、修手表、做木工活儿……他说, 从小他就爱动手琢磨, 谁家有东西坏了拿给他, 他一准能给修好。

“主要就是享受成就感, 那感觉美滋滋的, 比钱强多了。”他说。



盛向东作品



3，烙铁火烫，在纸上作画

用火烫的烙铁，在易燃的纸上烙出精美的画，似乎不可思议，然而，一位普通的农民，当场捧出一幅幅作品……



张革是大同市惟一个烙画艺人。十多年前，他偶然从电视上看到葫芦烙画，引发了他浓厚的兴趣。凭着天分和幼时学习素描的功底，他大胆地开始了烙画创作。为了满足创作的需要，他甚至把家里的一块菜地全部改种了葫芦。

“葫芦烙画主要难在画面是凸出来的，如果按正常比例烙在葫芦上，画面就变形了。”张革说，由于没有任何老师指导，刚开始摸索烙画的时候费了不少心思。而现在，无论葫芦是大如茶壶，还是小如手掌，他都能随心所欲地加以发挥，烙出各具特色的画来。



除了葫芦烙画，张革还大胆尝试在各种材料上作画，如木板、皮革等，甚至突破了在宣纸上不能烙画的难题，在薄薄的宣纸上烙出浮雕效果来。“在宣纸上烙画，烙笔温度要高，手一定要快，稍有迟疑就会把纸烫破。”

张革没有拘泥于临摹名家画作，他希望能有自己独创的题材。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翻阅了众多的书籍和插图。目前，他独立创作的宣纸烙画《众仙祝寿》已多次参赛获奖。而他的各种烙画，也深得大家喜爱，不时有人上门要求定做。

已获得成功的张革没有一点骄傲，他说：“我就是个喜爱烙画的农民，地道的农民。如果有机会带动更多的人来关注这门艺术，我会更高兴。”



纸上烙出的画《众仙祝寿》（局部）

4, 贫穷的木匠“圣手”

据大同工艺美术协会的人介绍，大同有一个富有天赋的艺人叫邓宗存，他用细如笔芯的木杆做出了应县木塔的缩微版，被人称作木匠“圣手”。



沿着曲曲弯弯的狭窄小巷，我们找到邓宗存的家。眼前的那种贫穷和破败很让人惊异：杂乱的棚顶、破旧的木板，还有在寒风中迎风飘舞的塑料布门帘。

一位大娘闻声迎出来，她笑容满面，十分和蔼。她说，儿子不在家，到外面帮人做木活儿去了，不过家里有一件他的作品。

屋里不仅十分贫寒而且很狭窄，四五个人站进去，转身都困难。大娘一再致歉，说屋里不成样子。邓宗存没有固定收入，又喜欢花大量时间去做挣不了钱的微缩工艺，一家人主要靠年迈的父母拾破烂维持生活。因为家境贫寒，他想去外地看看其他建筑景观实景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这大大地束缚了他的创作灵感，到现在，他只看过真实的应县木塔，他就据此做了一件作品。

大娘招呼家人收拾桌子，小心翼翼地抬出按100:1比例缩微的木塔。作品果然精致，斗拱檐角乃至匾额全部严格按原型制作，连窗格上的花纹都清晰可辨。用指尖轻触门扇，竟然可以灵活地开、关。

在这个十分贫穷的家里，大娘一直乐呵呵的，那不是装出的快乐，而是发自她内心。我忍不住连连给她拍了好几张照片，心中很感叹。

送我们出门时她说：“一家人在一起，钱可以想办法，可手艺就只有他会啊，我儿子脑瓜可灵活了，困难总会度过去的……”



5, 沉浸在雕刻里的那种快乐

进到姚家院子，入眼便是一副其乐融融的景象。父亲姚盛盘腿坐在暖暖的炕上，两个儿子坐在身边。他们正是大同市内有名的两代木雕艺人。



姚建福在父亲的指导下，十多岁便开始学习家传手艺，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几乎全部待在木雕房里。经过十多年的刻苦钻研，他的木雕渐渐做出了名气，甚至超过了父亲。

在姚家，最显眼的木雕作品便是缩微仿真的三块龙壁。姚建福的二哥说，龙壁（指大同的九龙壁、五龙壁、三龙壁）是大同所独有的文化精品，作为大同的手艺人，创作龙壁木雕得天独厚，龙壁木雕是姚家的独创。

姚建福的工作室里，还有缩微的仿古建筑、展翅欲飞的老鹰等。姚建福说，为了生活，他会按照买主的要求雕刻一些作品，但他最快乐的，是把自己关在斗室里，按照艺术灵感去精心创作。他说：“做那些赚钱的作品，一般来说不会太上心。可是创作自己喜欢的作品就不一样了，灵感一来，饭都顾不上吃，沉浸在艺术创作的境界里很快乐。”



缩微的仿古建筑



缩微仿真九龙壁

6, 机车艺术的“工程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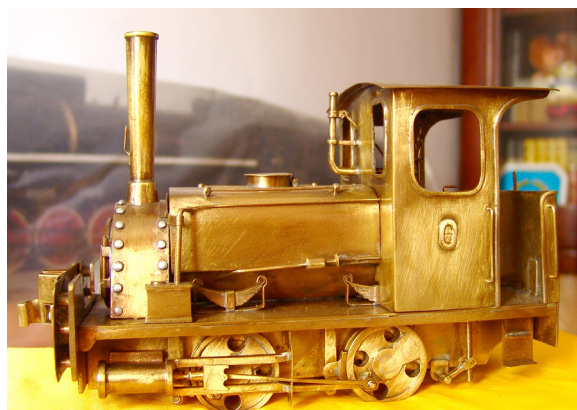
见惯了古朴的泥塑、剪纸、雕刻等手艺，却没想到在大同见识到一样充满现代气息的手艺——仿真机车模型制作。它诞生在一个温文尔雅的机车工程师尹明刚手中。



大同是我国著名的机车制造基地，在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尹明刚亲眼见证了从蒸汽机车到电力机车的发展变化。“国内的机车，哪一年出了什么新型号，其外部特征、内部结构，我全部烂熟于心。我没什么嗜好，闲下来的时候，就只好琢磨机车玩玩。”

没有想到的是，当时只为打发时间“玩玩”的消遣，渐渐演变成尹明刚的绝活，并引发了他最大的梦想——开个国产机车仿真模型的小型展览馆。

为了追求艺术效果，尹明刚不惜成本用铜作材料。他制作的仿真机车，轮子都同真的机车一样可以连动，比拇指尖还微小的排气口盖、炉膛盖全都可以打开，就连机车内用来铲煤的炉铲、铁钩，尹明刚都按比例缩微制作。



蒸汽机车已经远离我们，它将作为历史文物而进入陈列馆。但是，在尹明刚手下，它会焕发特有的魅力，引发人们去回顾那一段逝去的岁月。

7, 铜火锅，大同一绝

大同也是中国著名的民间铜器产地之一，历史上曾有“五台山上拜佛，大同城里买铜”之说。早在两千多年前，当地就有了铸铜业，北魏时期就享有盛名。



在大同铜器中，铜火锅最为有名。铜火锅是一种将火与锅巧妙结合，能搬到饭桌上的食具。它的产生与大同的自然环境有关。大同地处雁北塞外，气候寒冷，火锅既可作食具又可取暖，加之大同在古时为游牧民族聚居地，部落不断迁徙，铜器方便耐用，铜火锅因此诞生，并逐渐成为当地著名的工艺品。还有一种说法是：朱元璋第十三子朱桂（1374—1446）喜欢宴饮，却因寒冬长宴上的凉酒冷菜烦恼不堪。一位聪明的臣子召集工匠，研制出将鼎下的炽炭和鼎内的高汤结合在一起的食具——铜火锅。这位臣子由于奉献火锅有功，当场被加官三级，所以，至今当地人还把铜火锅称作

“速升锅”。

我们在一个作坊里采访了制作铜火锅的艺人李安民，他说，大同铜火锅主要有名在手工锻造技艺上。它们全用上乘黄铜制成，上锅下灶，中间通风，既精致美观又方便实用。火锅内里涂锡，既防锈消毒，又可保持食物原来的味道。而锅身上精致形象的图案，更成为大同铜火锅之“一绝”。九龙攀壁、二龙戏珠、八仙过海、狮子滚绣球、鸳鸯戏牡丹、喜鹊登梅、燕子穿柳、彩蝶飞花等等，为铜火锅增添了鲜明的民族艺术韵味。



铜火锅工艺主要靠口头流传，至今没有确凿的史料记载火锅的样式、流程和做法。李安民说，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合作社模式，使得铜工艺市场消退；近年来原料价格猛涨，加上机械化批量生产，大同铜火锅的发展前景不妙。作为传统的老艺人，李安民深深担忧：“大同铜火锅传承了几百年，才树起‘大同一绝’的品牌，可是声誉一旦毁起来，也许就是几年的时间。”



他说，他想带着铜火锅到四川走一走，他相信那里的市场广阔得很；但他又想安心静下来，把自己这几十年来琢磨研究出来的工艺、心得、诀窍、样本，搜集整理编成册子，给后世留下一本可供参考的文字图片资料。

“越是困难，越是要努力做出精品，只有

这样才能让大同的铜工艺保存下来。”他说。

8，折纸天才，你还能坚持多久？

他是一个帅气而腼腆的小伙子，大同唯一的一个折纸艺人，他的作品几乎全部来源于头脑中一闪而过的灵光。没有模仿、没有借鉴，没有传承，每一件作品都是独特的原创！

张玉春，一个极其罕见的天才人物，孤独地呆在他贫寒的家里，没有固定的职业，也没有一点经济收入，成天，在只出现在他脑海里的那瞬息万变的灵感引导下，创作出一个个具有独创“知识产权”但却没人关注更没有人购买的艺术品。



张玉春和他创作的《中国龙》

2000年的一天，张玉春去给小外甥买折纸书，不料发现，折纸书很少，仅有的几本，不仅内容雷同，而且符号复杂得连成年人都看不懂。他于是想：能不能发明一种简单易学的折纸方法？

这个念头一出，他便走火入魔，冥冥中仿佛有一种奇特的召唤，引导他进入一个充满奇思怪想的空灵世界

他一头钻进这个世界，没有老师讲解、没有师傅传授、没有书籍引导，只有只一闪、一闪、一闪而过的“圣灵之光”，在这“圣灵之光”的引导下，他废寝忘食，终于发明出一种数字和线条相结合的折纸方法——折谱。他把它命名为“数字化智能折纸法”。

据说，用这种方法，上至不识字的老人，下至三岁娃娃，都能很快掌握。

他希望他的专利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使之推广，没有；他去幼儿园，渴盼有人慧眼识珠，引用这专利指导儿童。“这真的能开发他们的动手能力，还能开启儿童的心智，启发他们的想象力。”张玉春说。可是，仍然没人理会。

他只有独自一人在家里“自娱自乐”了。

这一“自娱自乐”就是五年多。张玉春在自己发明的专利指导下折出了5000多件作品，从飞禽走兽到花鸟虫鱼，从舟车器皿到故事人物，无一重复。一张普通的纸，在他手里很快就能变成飞翔的鸟儿、绽开的花儿……

他的折纸不剪不粘，完全利用折、叠、卷、翻等手法，表现出各种物体栩栩如生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无一范例，全部是自己独创。他说：“我脑子里的想法层出不穷，想到什么物品，基本上都能用折纸表现出来。”



张玉春手下的千姿百态的鸟儿

张玉春在那奇特灵感的指引下，创新不断，作品从平面发展到立体，从单色发展到套色。最令他骄傲的作品，是2005年春创作出来《中国龙》。

那天是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日子，他脑子里突然又一闪：用纸折一条龙！怎么折？不知道。

张玉春足不出户，在简单纸张的复杂世界里苦苦探索，终于，一个多月后，一条长约1米的龙“诞生”了。（他大拇指为此疼了五个多月）

采访时，张玉春捧出了纸龙。即使亲眼所见，也很难想象这条龙仅用3张全开纸折叠而成，仅龙身便缀满193朵牡丹花。张玉春说，他看到在一本书，一个专门研究折纸的美国博士提到，世界级折纸大师也只能用一张纸折出十八到十九个角，而他的这条龙，全身一共有808个角。



《中国龙》局部

2005年6月，张玉春带着作品到北京参加第二届中国工艺品博览会，主办方对他的作品评价非常高，但他们说，国内目前缺乏折纸方面的专家，无法认定其价值。

张玉春还无法找到同行交流。他说，他很羡慕周围那些做传统手工的艺人，因为他们聚在一起总能碰撞出艺术的火花，而他自己，只能在一个人的世界里独自创作。

张玉春没有工作，没有一分钱收入，如果没有母亲的支持，他可能早已放弃了。为了见见这位开通豁达的母亲，我们在河边一片杂乱的民房中找到了张玉春家。

推开铁门，一个狭小的院子出现在眼前。屋里，一张火炕占了大半面积，一部用了二十几年的老缝纫机贴墙摆放，此外再没有多余的家具。在这样拮据的环境里，张玉春仍能得到母亲的支持？



张玉春作品

一问，头发花白的张仙云立即哽咽：“不是我不支持，可我真的已经撑不住了……”

她说，儿子最初迷上折纸时，她很反对，因为毕竟不是正当职业。可是随着儿子一件件活灵活现的作品赢得邻居们一致称赞时，她改变了看法。在儿子最动摇的时候，她还鼓励儿子说，这个方法简单易懂，尤其能锻炼动脑动手能力，将来推广出去一定大有市场。

可是，这个“将来”迟迟不来，六年过去了，全家只靠她丈夫几百元的退休费支撑。

由于一心扑进折纸世界，张玉春极少同外界交流，连交女朋友的时间都没有（想必也很难有“女朋友”愿意嫁给他）。他已经33岁了，那间本是留给他结婚用的房子，也



被他变成了工作室，屋里屋外、桌上床下到处堆满作品，连门帘都是用无数纸鹤组成。

“他的作品每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其实我也舍不得让他停止创作。”张仙云抹着泪说：“但我也是一个平常的母亲，希望儿子能过正常日子。”

其实，一些具有独特才华的人物是不能过正常日子的。当然，前提是要能活下去。

张玉春说，折纸看似简单，但要折出创意着实不易。艺术的灵感是不等人的，一旦有灵感，要马上付诸实践，否则第二天就会忘掉，为此，他经常熬夜。

折纸起源于中国，但在国内折纸却无人问津，以至有人提出折纸的发源地是否在中国的疑问。在国外，折纸活动很活跃，被广泛用于开发智力、娱乐等方面。许多国家都成立了国家级折纸协会，每一两年还要举办一次世界级的折纸展览。

大同工艺美术协会曾多次向政府部门反映张玉春的情况，希望他们能关心一下大同这位不可多得的奇才。但是，没人理睬，我们的政府部门有太多太重要的事需要关心，轮不到他。

临走前，我们无意中看见一张放在桌上的欠款单，显然，眼下他们正在借债度日。

母亲已经泪水涟涟，儿子还能“贫贱不能移”？

其实，张玉春已经很忧虑了，他说，父亲年事已高，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唯一的生活来源就要断。

到那时，还容得他在纯艺术的美妙世界里翱翔？

（“大同城里的手艺人”与段金枝合写）



张玉春和母亲面对那不能
变作钱的作品

六，让大同把根留住

他不精通任何手艺活儿，却被一群手艺人心悦诚服地推举为领头人；他名义上是个“官儿”，却一直在自掏腰包，做着没有什么经济效益的文化事业。

他同那一帮大同的艺人一样，深深地热爱这片土地，热爱这份文化。他忧心忡忡，唯恐艺人流失，他禅精竭虑，一心想把大同的根留住。

他叫李东健，是大同市工艺美术协会的秘书长。



爱家乡是中国人甩不掉的情结。我能和一群手艺人走到一起，正是这个原因。

大同是一个具有沧桑历史和丰富文化的城市，说起大同，哪个大同人不骄傲？大同的木塔、恒山、悬空寺、云冈石窟、上下华严寺、九龙壁、五龙壁……各类文物古迹保存得相对完整。这四个原因：第一，大同号称佛地，大部分人都有宗教信仰，不自觉地就保护了文物；第二，大同西临黄河，东临太行，北有阴山，内长城蜿蜒其南，大同人不便外迁，长期保持着“小而全”的局面；第三，大同自古是个经商的枢纽城市，商人讲究“和气生财”，喜交往而厌霸气争斗。第四，大同文物的总数很多，虽然毁掉了一些，但仍有部分留存到现在。

热爱传统文化是我们的追求。在大同，打造、探索、追求文化的只有我们协会里这群热心的人。大家不拿一分钱，都是凭着热情在摸索、在支撑、在拼命。大同有八十多个手艺人，这帮人全都是自己赔钱坚守的“傻人”！现任协会经理的常德平，是被这帮“傻人”吸引进来的第二个“门外汉”。当初，他很奇怪，这帮人为什么这么痴迷，甘愿贴钱来做一些没有“效益”的事，他走进来接触之后，明白了这帮人的情操和追求，他被深深地吸引，竟也成为这帮“傻人”中的一员，不仅义务地出点子、跑腿打杂，更是经常贴钱请这帮人喝酒聚会，以增强大家的凝聚力。（采访期间，常德平陪同我们走街串巷，提供种种帮助。）

2005年6月，我以工艺美术协会的名义牵头组织文化广场，反响很不错。连市旅游局局长都说：“不来你们这儿看看，我还真不知道咱大同有这么多令人瞩目的手工艺呢。”而我们这群手艺人也觉得，只要能组织起来干下去，还是能唤起市民们的文化感受、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的。



九龙壁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原为朱元璋第十三子，代王朱桂府前照壁。

九龙壁全长45.5米，高8米，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琉璃龙壁，是全国重点文物。



九龙壁（局部）



大同三龙壁

为什么这样说？计划经济时期，大同有13个大矿，仅矿工家属就有一百多万人！这些人大部分住在棚户区，生活贫困不堪。眼下，随着技术的提高、设备的更新，劳力就显得富余。矿工子女没有良好的教育环境，没有良性循环的就业环境，而高危行业又容易使人出现及时享受的心理，黄、赌、毒问题逐渐显著。另一方面，大批外来工带来了一些不良习气以及一心只为赚钱的急躁，这些都对大同和大同人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使得大同这样一个文化古城反而日渐缺乏文化气息。所以，当我们看到传统手工艺还能吸引大批市民的时候，我们不仅有了深深的欣慰，还有了沉重的责任感、使命感。

文化展览的社会效益远远大于经济效益。很多人不理解，问我们：“只要把展览中心的摊位出租出去，坐等收钱，岂不好过现在的‘劳而不获’？”我说，要以今天的悲哀换来明天的辉煌。尽管我们都只是些小市民，有些甚至还在贫困线上挣扎，但我们追求的恰恰却是更高层次的社会效益。大同应该有自己的文化名片，把它打造出来，不仅可以振兴民族工艺，还可以突出特色旅游，从长远上讲，甚至能陶冶人的情操，提高大同人的整体文化素质。



辽代石雕大佛



大同始建于辽代的华严寺

对手工艺行业来说，我是一个外行人，但在这样一个富有使命感的大家庭里，我们有长远而详细的计划：能够产业化发展的手工艺门类，我们要纳入；不能形成产业的，我们要鼓励艺人相互交流合作，结合起来寻找市场切入点，进行整合。一方面突出大同

的地方文化特色，一方面加大对外宣传力度。

我们是一群傻人，背负着来自个人、家庭乃至社会各界的压力，即便刚刚看到希望的文化广场被迫中断，我们也没有想放弃。我们热爱这片土地，热爱这份文化，我们甘愿为此付出。

但是，我们毕竟也要生存。你们看到了，非常有才华的折纸艺人张玉春生活已经难以为继，他已有到北京去摆摊的念头。其实，我们在最困难时，也没有想去找政府给点钱，我们迫切需要的，是政府给一点政策、有关部门给我们一些支持、给我们发展空间。仅此，我坚信我们就能站稳脚跟，独立发展起来。

眼下我们没有退路，也不允许我们犹豫。因为我清楚，如果手艺人因生活所迫漂流到外地，大同的根就没有了。

留住手艺，留住文化，才能留住我们大同的根。

结束语

穿过雄浑苍凉的雁门关，扑面是塞北高原的风。

二月的塞北，天寒地冻，朔风起处，云乱峰摇，天地间涌动着一种悲壮的凄美。

进入塞北名城大同，现代都市的风情和悠长历史的遗存，消解了天苍野茫的地域荒寒；而电厂那一群倾吐着滚滚黑龙的巨大烟囱，又屏蔽了边关烽云的历史感怀。

大同，这颗镶嵌在塞北边关土地上的明珠，既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也是著名“厚黑”煤都。

历史，在这儿遗存了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丰灿文明；大自然，在这儿积淀了以层叠煤炭为主体的厚重物质。丰灿和厚重共同打造了这座城市的魅力。有旅游者鱼贯而来，寻幽探胜；有打工者蜂拥而至，求财寻富。风急急，尘漫漫，塞外冷月不再孤寒。

然而，生活在丰灿和厚重之中的大同手工艺人们却并未在这魅力四射的名城里如鱼得水名利双收。

他们聚成一个群体，怀抱着各自的手工绝技，坚守着共同的文化情结，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

只是，捉襟见肘，一个比一个贫寒。

微塑艺人邓宗存皓首穷经创作了难度极高的应县缩微木塔，可却不得不靠父母拾荒和自身下苦力来维持“低保”生活；折纸艺人张玉春虽然是有独创能力的天才人物，但眼下如果再没有一点“物质”的抢救，这个全身心沉浸在精神世界和艺术创作中的“珍稀动物”，命运将不如大熊猫。

文化坚守为什么总是与生活贫困亲密结合？在南下北上的采访中，我怎么总是见到“张玉春”、“邓宗存”？

据说，文化是“根”，在文化死去的地方，历史也将消亡。但是，广袤的土地上，只见物质世界的金戈铁马，傲然驰骋在精神王国的芳草绿茵；只见形单影只的文化坚守，逐次割地于汹汹逼近的生存威压。

有没有一条将文化坚守与经济效益互动、将传统工艺与现代需求结合的阳光大道？

据说，有探索者和实践者在这条道路上成功的笑脸。（其实，大同艺人们在李东健的带领下，就有过一次积极而颇有成效的实践。只是可惜，数月后，“政策”突变，他们的群体冲锋，在大同文化广场上戛然而止。）

结合的道路也许不乏阳光，互动的探索一定充满艰辛。只愿，在“冲锋戛然而止”的退场中，在苦苦坚守的碰壁后，有晶莹的心灵，超然于“成王败寇”的评判准则，灯光黯然的院坝里，没有“不切实际”的落幕嘘声。

一天晚上，李东健，一个铁骨铮铮的北方汉子，在灯下侠骨柔肠地说：“我们热爱这片土地，热爱这份文化，我们甘愿为此付出……留住手艺，留住文化，才能留住我们大同的根。”

那一刻，又让人体验到那种深层次的感动——一种物质的威烈所不能触及的深层柔软。

离别大同的早晨，大同艺人中最为贫寒的折纸艺人张玉春孤身前来相送，他顶着凛冽寒风，穿过整个城区，双手捧上一件礼物——两个纸折的艺术品。这实在是太不起眼的礼物，既无艳丽色彩，更无昂贵质料。然而，用心看去，那千百个重叠交错匠心独运的折角，无不细细密密浸透了一个清纯心灵“把根留住”的精神境界和一双巧手巧夺天工的独特才艺。

在物质世界金光灿灿的长空里，苍白的折纸轻盈地独舞，她冷寂而孤傲，脆弱但高贵。纵然浮躁的心灵世俗的眼光不屑一顾更读不透彻，但“纸折的艺术”一定比“物质的威烈”更长久地高翔在民族记忆的天空。

汽车开动了，十里长亭，折柳相送，张玉春从窗外伸手握别。那一刻，执手相看泪眼，“留恋处，兰舟催发”。

出雁门，广袤的中原大地扑面而来——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这篇“结束语”是我在《中华手工》杂志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此后，我被迫离别了这个我艰辛开创并用整个身心热爱的园地，开始了我的第七次，也是最长（近两年）的、最为痛苦的一次失业生涯。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与李志正、张玉春、李东健合影于华严寺